臺大歷史學報第 67 期
2021 年 6 月，頁 279-332

BIBLID1012-8514(2021)67pp.279-332
2020.5.11 收稿，2020.12.11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106_(67).0007

重探傳統政制以應世變——一九四〇年代中國對政府－社會關係的另一種回答

林　易　澄*

提　要

本文討論 1940 年代前後三位學者的傳統中國政治制度研究：張純明以西方政治學分析「無為政治」，嘗試重組政府組織，但這一取徑遭遇侷限；錢穆從史學發掘「學治」回應現實，卻又感到學術獨立與近代政府擴展之緊張；費孝通調查農村經濟，注意到地方「雙軌政治」之破壞，最終走向知識社會學探索。此課題沉寂多年，為何當思想主流更趨向激進變革，不同學科卻出現相近關注？本文指出三項研究反映出共同時代問題：當政治目標轉向有為，如何確保「政府－社會」連結，而非盲目以新制度破壞社會？他們從各自學科脈絡，反思晚清以來視傳統政治為專制之說，分別察覺「政府－社會」之間行政組織薄弱，重新探討傳統政府－社會間士人階層連結，指出現代國家建設未成卻已破壞地方團體，進而思考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社會之脫節，期望重建連結，確保「政府－社會－知識」之聯繫，以達改革成效。儘管這些思考未及充分對話，也未引起太多迴響，但作為潛流，他們顯示五四以降學術的新發展：一種在新派、左派、傳統派之外的定位，並非移植西方制度，而是以西方知識資源，從歷史角度重新認識傳統制度與社會，以推動變革；就此，面對國家建設、戰爭破壞下社會秩序之崩解，提出不同於徹底重造理想社會的另一種回答。

關鍵詞：中國傳統政治制度　1940 年代人文社會科學　張純明　錢穆　費孝通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115201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E-mail: lastplainsong@gmail.com.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張純明：西方政治學下中國「政府—社會」連結的薄弱
二、錢穆：從史學重探傳統「政府—社會」之聯繫
三、費孝通：以功能論連接「傳統社會—近代政府」
結 語

前 言

從余英時 1988 年指出「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之後，儘管激進與保守的具體表現、階段特質仍有爭論，三十多年來，學界大體同意這一分析。[1]關於 1940 年代中國學術思想狀況，亦有比較普遍的看法。晚清以降，中國傳統政治倫理秩序遭遇衝擊，現實政治混亂，缺少穩定基礎以衡量激進與保守雙方變革主張，致使思想與現實分家，在激進軌道上向前飛馳。到了戰時，經濟失序，行政失能，中產階級破產，進一步加深對烏托邦式整體變革的企求。五四以來形成的幾種思想主張，在此面臨不同境況。自由主義主張民主制度，從解決個別問題著手改革，無法提出一套解決整體問題的方案。文化保守主義側重傳統價值，但僅能回應個人內心危機，難以提出制度設想。社會主義則以一套整體性理論許諾未來，強調平等公正的理想社會，吸引著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儘管隱含教條盲目改造的危險，隨著現狀越來越壞，激進化衝力較戰前更為加速，「徹底打破現狀，建造一個全新的理想社會」的方向，顯著地壓過「在現有社會體制的基礎上逐漸推動現代

1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和保守〉，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2015〔1991〕），頁 205-215。1988 年 9 月演講於香港中文大學。相關討論並見余英時，〈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答姜義華先生〉，《二十一世紀》總第 10 期（1992 年 4 月，香港），頁 143-149；許紀霖，〈保守與激進的迷惑〉，《二十一世紀》總第 11 期（1992 年 6 月，香港），頁 137-140。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轉化」。[2]

於此，五四之後知識界兩個重要發展均告中輟，難以回應政治上國共兩極對抗的局勢。首先，從 1920 年代開始，中國近代學術社會逐漸建立，儘管精神意趣相異，新舊各派學者仍能在追求學術獨立的方向上，各自著述，研討商榷。此時，現實危機與主義崇拜氛圍中，「學術獨立」日益受到攻擊甚至自我懷疑，信念深受動搖。[3]其次，1930 年代初期短暫數年間，在南京政府統一國家基礎上，圍繞如何建立政治中心等問題，激進與保守主張曾一度形成具有共同現實根據的公共論辯。到了 1940 年代，先前「民主與獨裁」論戰之際的共識已一去不返。現狀的惡化與思潮的激進，使知識界菁英迅速分裂，或選擇認同中共，或不得不站到另一邊與國民黨同進退，或抱持自由主義面對夾擊，都在一元化的政治意識形態下日趨邊緣。[4]

本文擬由 1940 年代前後，三項傳統政治制度的研究——政治學者張純明（1903-1984）的「無為政治」、歷史學者錢穆（1895-1990）的「學

2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和保守〉，頁 206-223；許紀霖，〈二種危機與三種思潮：20 世紀中國的思想史〉，《戰略與管理》2000 年第 1 期（北京），頁 66-71。

3 參見錢穆對戰前北京大學學風之回憶。錢穆，《師友雜憶》（1982），《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收入氏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1 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1998），頁 186。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建立不受政治干預、獨立自主的學術社會的嘗試與困境，見王汎森，〈「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以陳寅恪為中心的考察〉，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463-471。亦須指出，此前「學術獨立」並非未受挑戰，傳統派、左派、國民黨黨化教育均對之有所批評，但大體上直到 1930 年代中期，尚能保持堅實的發展。同時，部分靠近傳統派的學者如錢穆，儘管不認同去除價值脫離社會的研究，但對此學術社會仍有一定認同期許。

4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和保守〉，頁 215-223。並可參見錢端升 1941 年的觀察：「國內有三大事，即國共爭，物價漲，日又有侵入滇省模樣。然弟所見，最糟者仍是政治無進步。自號進步者無論共或反共，均是 totalitarian（極權主義者），亦是不願入軌道者，其餘更可知，奈何。」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錢端升致胡適（1941 年 1 月 21 日）」，頁 7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社會學者費孝通（1910-2005）的「雙軌政治」與知識社會學分析——對這段歷史變化作一補充。透過重探傳統政制，他們對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政府在此過程中的角色，及其與社會的關係，提出了另一種觀察，以回應時局危機。他們三位的立場分別接近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但也各自與這些主張保有距離和反思，嘗試提出一種整體的、制度的、並基於傳統政制與社會認識的變革方案。這一方案關注系統性的變革，但並非出於理論綱領，而來自對既有制度運作的知識分析。現實危機中，他們並不「為學問而學問」，與此同時，其時局建議，仍建立在實證性的學術研究上。從而，他們雖在兩黨之間各有偏向，但都維持思考的獨立，使提案具備公共討論的合理性。張純明與國民黨政學系較為靠近，於 1930 年代後期投身政府工作，但對時政亦多有批評；錢穆高度評價三民主義的傳統文化淵源，在具體政制上則持不同看法；1940 年代中期，費孝通參與「中國民主同盟」，隨著國民黨和民盟關係惡化，立場逐漸左傾，但與中共在土地、地主階級問題始終有著不同觀點。[5]三人各自獨立卻蘊含連結的學術關注與提案，有如一股潛流，與前述主流變化相對但又內在相連，呈現出對「政府—社會關係」的另一種回答，提供了考察這個時代的一個切入點。[6]

5 除本文第一節對政制改革的學術思考，張純明 1947-48 年主編的《世紀評論》上亦多刊有對國民黨的批評，其中傅斯年所寫〈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便是一例。人際關係上，張為何廉連襟、和蔣廷黻友好，何、蔣同為 1930 年代中期參加政府的學者，均被視為政學系成員；錢穆 1926 年讀到三民主義時「震動佩服」，1930 年《國學概論》且將之置於全書末章，但亦終生不欲入黨。見錢穆，《師友雜憶》，頁 135。錢穆對近代政黨與政制變革看法，見本文第二節；費孝通與中共土改方案差異，見本文第三節。

6 需要說明的是，學術討論常用「國家—社會關係」（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政府」則對應「人民」。本文使用「政府—社會關係」，原因在於：一、「國家」一詞雖見諸傳統典籍，但多指王朝政權；晚清以降，對應西方 state，而有新的涵義：與「國民」一體相連的「國家」，許多人據此認為中國未成「國家」。若採「國家—社會關係」，討論此時觀念與制度轉型，將有所混淆。二、承上，當時「國家」一詞使用較為寬廣，有時接近舊有涵義，與「政府」相近，有時則指涉包括政府、人民的整體中國。相對於此，「政府」涵義變化較小，採用「政府」可更為聚焦。三、較之思想觀念，本文三位學者更著眼政治制度轉型，關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具體作用。這使他們多以政府、政權、政

臺灣大學學術倫理資料庫

晚清之際，譚嗣同（1865-1898）首揭「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猛烈批判傳統政制。[7]梁啟超（1873-1929）繼之論斷中國是「數千年君權專制之國」，比較西方政體各階段，寫成〈中國專制政體進化史論〉等文具體立論。[8]儘管日後梁氏對近代國家主義亦有反思，但流風所被，專制之說深入人心，傳統政治制度研究長期沉寂，甚至直到1931 年，北京大學都未曾開設相關課程。[9]透過考察三項傳統政制研究，

治機構、政治組織等詞彙（也參用「政府」涵義的「國家」），分析轉型的政府與舊有社會組織之互動（「社會」亦為舊詞新義，但指涉較「國家」清晰），例如費孝通便提問「處於激速變遷中的社會是否需要個強有力的集權的中央政府？」（費孝通，〈再論雙軌政治〉〔1947 年 10 月 26 日〕，《鄉土重建》，收入氏著，《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158。）考量上述轉型時期情況，取「政府－社會關係」，以貼近當時學者用語，並讓探討對象更為明確。

7 譚嗣同，《仁學》（1896）（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頁 96。

8 梁啟超，〈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1901）、〈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1902），分別收入氏著，《梁啟超全集》第 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512；第 2 冊，頁 771-787。梁氏政治思想約有三變，早期持「破壞主義」，欲破舊有倫理與專制政體之束縛，造新民以立國；1903 年後轉向調適觀點，重估舊道德與菁英作用，倡導國家主義建設；1918-19 年後，則對國家主義有所反思。梁氏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間，有一動態連結，學者探討各有側重。從破壞到調適之轉折，見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1994〕）；對國家主義前後思考，見沈松僑，〈近代中國的「國民」概念，1895-1911〉，收入林毓生主編，《公民社會基本觀念》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4），頁 727-783。梁氏晚年觀點，帶有重估傳統政制的可能性，惟未及開展（見本文第一節討論）。整體而言，如本文所呈現，梁氏提出專制之說影響深遠，為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認知。

9 1932 年錢穆在北大歷史系擬開「中國政治制度史」，卻為系主任陳受頤反對，謂「中國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專制，今改民國，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多次爭執，方得開設，然而歷史系竟無人選課。待法學院長周炳霖認為政治系學生只知西洋不知中國政治，令學生前往聽課，才有歷史系學生陸續旁聽。就此可見當時學界、學生對傳統政制的一般看法。錢穆，《師友雜憶》，頁 173-174。北大政治系則遲至 1935 年才由陶希聖開設「中國政府」。惟未幾他便參與政府工作，暫別學術，當時課堂講授的《秦漢政治制度》，日後學生曾資生整理材料而成的《中國政治制度史》，兩書均僅論及官制組織沿革，未能進一步見到其「社會史觀」對傳統政制的整體思考。見陶希聖、沈任遠，《秦漢政治制度》（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 1。1930 年代之前，相關學術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授權

本文希望回答下列問題：為什麼在思想激進化更為強烈的 1940 年代前後，不同學科與知識脈絡出現了相近關注？為什麼在烏托邦與主義意識形態牽動人心之際，出現了對舊日制度具體運作的分析？他們對「政府—社會關係」與中國變革的看法，相較五四一代及此時青年，有什麼差異？他們屬於戰前近代學的餘緒，或與戰爭後加劇的激進化思潮同為面對失序的回應？若是前者，他們受到哪些新學術的影響，為何又如何用以考察傳統政治？若是後者，對傳統制度的分析，使其構想與激進一方有什麼不同？若兩者皆具，是否可對 1930 年代學術發展與 1940 年代激進化氛圍之間聯繫，有一些新的觀察？

費孝通 1947 年的一篇回顧，為這些問題提供了初步線索。他指出晚清以來，新思想與制度引進，多未考慮與舊有社會的關係，只是新的教條，反成破壞，呼籲重新認識中國社會。他首先從社會學在中國三十年，反思近代學術的發展：

> 從嚴幾道先生翻譯《群學肄言》起到「五四」這一段時期裡，正是中國社會大變動的開始，是傳統教條權威的破壞時期。……「五四」初步地把破壞過程做一總結。……但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在那時只是兩張名片罷了。……這些名詞底下所有的內容，在性質上並沒有和傳統的思想有很大的出入，大多還是「教條」，大多還是「應當怎樣」的主張。[10]

他說，五四以後社會學缺少革命性與社會主義分家，卻又因此瓜葛受到新學術文史主流冷落。中國現實社會反而長期缺少觀察、分析與解釋。[11]

他進而將自己區別於下面三種觀點：他指出傳統思想雖關注社會關係，所問卻是「應當怎樣」，而非「怎麼會這樣」的科學研究；他贊同

不多，跳脫專制觀點者更為稀少，僅見柳詒徵談及封駁制度時，反對專制之說，惟數行而止，未及深入，亦未從新學論述角度反擊，影響有限。見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1925〕），頁 526。

10 費孝通，〈中國社會學的長成——為《日本社會學會年報》寫〉（1947 年 9 月 18 日），收入氏著，《費孝通全集》第 5 卷（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頁 412。

11 費孝通，〈中國社會學的長成〉，頁 413-418。

臺灣大學圖書館

社會主義者對中國社會性質的關切，但也嘆息教條制約了討論；他亦批評政府與新派專家的現代化方案與民眾缺少聯繫，不斷試誤繞路。[12]與此同時，他期待一個正在開展的嘗試：認識中國社會以達成有效的設計。他指出戰爭以來新的變化「把以前可以終日和普通人民毫無接觸的學者送入了破廟和農舍裡」，「實際問題的嚴重，他們無法不正視現實，把他們多年來熟習的理論，在現實的人民生活中去求證實和否定了」。[13]

這一回顧揭示，五四過後三十年，在新派、左派、傳統派之外，逐漸產生灰色地帶，指出改革方案必須基於對中國傳統與現實社會的認識。[14]時間稍前，錢穆與張純明也在各自知識脈絡中，寫下類似思索。在 1940 年的《國史大綱》，錢穆將自己區別於近代史學「傳統」、「科學」、「革新」三派。他指出，傳統派記誦典章，科學派割裂史實、局部研究，都缺乏系統、無意義。革新派雖有意結合史學與現實，但對史料取之革新態度，結果「急於事功而偽造智識」；「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未能沉浸已往歷史知識找出改革方案，事功也就有限。[15]

當錢穆從傳統出發，對傳統派提出批評，主張建設現代化政治的張純明，也直指新派弊病。張指出許多留學回來的教授對本國社會沒有認識，導致學生「提起美國的經濟制度政治組織與社會機構則對答入流，若一問關於中國的事實，則茫然不知所云」。[16]張純明 1940 年在《中國政治二千年》進一步寫道：「我們政治經濟都是摹仿西洋的，但我們社

12 費孝通，〈中國社會學的長成〉，頁 410-411、416、418。

13 費孝通，〈中國社會學的長成〉，頁 416-417。

14 本文中使用新派、左派、傳統派，約與前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相通，因當時用詞不盡一致，就此作大致區分。

15 錢穆將革新派分為三，包括晚清新史學、新文化運動、唯物史觀；科學派則指整理國故運動。因學科不同，範圍亦出入，但區分基準仍與費孝通有所相應。錢穆，〈引論〉，《國史大綱》，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7 冊，頁 24-27。該文於 1939 年 6 月完稿，1940 年初版。

16 張純明，〈我國之高等教育問題〉，《國聞週報》第 14 卷第 23 期（1937 年 6 月，上海），頁 57-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本質……及生活觀念大體上還沒有改變」，要現代化，不能不認識舊有社會，然後養成新的觀念與道德，否則「理想與事實，計畫與實施，往往圓鑿方枘，鉏鋙難入」。[17]

這些思索，過去或未受注意，或僅就個人思想脈絡，又或學科史內部討論，[18]但若將之並陳，便可看到相近的學術轉折。一、伴隨國家建設與戰爭衝擊，1920 年代逐漸在中國建立的各人文社會學科，開始有學者察覺自身與現實差距，形成一共同取徑：不再以西方近代知識為標準來評斷中國，而試圖認識中國現實如何運作。二、他們都反對新的教條、虛造系統、盲目移植，但也在對照下，呼籲一種對中國有計畫、有系統、整體的認識。他們使用、修正西方知識架構，來評估中國舊有政治、社會、文化乃至經濟體制，也以此為傳統在現代化中的位置，打開新的空間。三、這種新認識，儘管基於實證性學術研究，但並不僅是「為學問而學問」，而從研究所見進一步提案，指向社會設計、事功與計畫。他們都關注現代國家的建立與政府作用，並提出一種新的政治構想。於此，他們所關注並非政治理論優劣，也非具體政策批評，而是實際上政治制度如何運作，有什麼阻礙，困難又源自於哪些歷史變遷。

誠如余英時指出，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社會體制不斷變動，缺少穩定體制作為激進保守雙方對話之共同座標，致使思想之激進化如同巨石走峻坂，不達平地不止。[19]上述動向終歸潛流，既體現這一論斷，但也反映出一個新的變化：以新舊制度具體運作的變遷為分析對象，能否形成共同討論，作為變革的知識基礎？雖然時風眾勢既成，通往 1949 年劇變的道路上，這一學術動向並未充分開展，沒有太多影響，彼此之間也沒有留下明確的論戰與回應。但是，從不同出發點走到同一問題，在各自知識脈絡下得到相近的、自覺的回答，或可說，五四以降新學術，在這

17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1940〕），頁 7-9。該書於 1939 年 8 月完稿，1940 年初版。

18 三位學者個別研究回顧，請另見各節開頭。

19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和保守〉，頁 210、226。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段時期有了一個新的開展，至少是一個新的開端。

下面各節，將進一步討論他們對傳統政治制度與社會關係的研究和提案。三人次序，除依主要著作時間，也透過知識架構比較，進一步展開這場當時未及開展的對話。第一節，討論張純明對中國「政府—社會」之間連結薄弱的覺察，及其重組政府組織的構想，呈現以西方政治學認識中國的嘗試與限度。第二節，討論錢穆以傳統學術對中國政治轉型的回應，如何發掘「學治」概念，以士人階層及其學術文化連結「政府—社會」，又如何遭遇近代政府介入擴展之緊張。第三節，則討論費孝通以文化功能分析連結現代化與傳統社會，如何在農村經濟調查中感到政府介入之兩難，進而探討士紳階層過去的政治與文化作用，從知識社會學分析提出一種新的「知識—社會—政治」構想。最後，對這一學術動向作一總結，以見 1940 年代的特殊性與學術遺產。

一、張純明：西方政治學下中國「政府—社會」連結的薄弱

張純明 1931 年取得耶魯大學博士回國，主持南開大學政治系。1940 年代，除一度擔任《世紀評論》主編，他主要參與政府工作，1949 年後更長任外交事務直至退休。他著作不多，學術生涯不到十年，過去很少受到關注。[20]但他代表了一個重要學術轉折：近代中國學者如何以西方

20 張純明生平見《傳記文學》悼念文章，惟兩文側重從政與外交，學術工作從簡。1940 年代，張歷任行政院秘書、河南省政府委員、中央設計局委員、立法委員，之後長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見周書楷，〈敬悼張純明先生——一位學者從政的典範〉，《傳記文學》第 45 卷第 3 期（1984 年 9 月，臺北），頁 22-26；田雨時，〈張純明學人從政書生論政典型：終而成其國際壇坫忠勤報國的外交鬥士〉，《傳記文學》第 45 卷第 6 期（1984 年 12 月，臺北），頁 32-36。學界僅有江勇振討論 1930 年代南開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時，提及張純明河北縣政調查。Yung-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3-1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治學面對自身傳統，並體現出這一取徑的可能與限制。

（一）西方所謂政權在中國還不存在

1940 年《中國政治二千年》刊印，張純明彙整基層行政調查、傳統典籍研究、政府工作所見，以西方政治學的觀點，重估中國傳統政府組織和政治制度。書中，他以歷史、系統的眼光，思考中國三十多年來政治變革的挫折：

> 自前清末年到現在，一般人把政治制度及其他各種的改革看的太容易了。每看見西洋人有什麼新穎的主義，新穎的運動，新穎的制度，我們就想馬上搬到中國來，……結果是機械的或割裂的模仿，盲目的提倡，忽而模仿其民治，忽而模仿其共產，忽而希望模仿其獨裁制度。舊的逐漸破壞，而新的卻雜湊起來，沒有一貫的條理。……對於本國的需要太不明瞭……。[21]

這種眼光提出一組新的分析框架：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不能只是機械照搬，必須基於對中國的認識。評判傳統制度，標準不再是西洋與新穎，而要考察舊有系統具體運作，從而了解其在新時代的問題與需求。

在此視角下，張純明對於傳統政治，具有和晚清以降知識分子相當不同的觀點。1901 年，梁啟超對照西方近代政治概念，以「專制」評判傳統中國政治，指出中國人因此「無國家思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從而「苟且偷靡，不慮其後」，不知「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此後幾成定論。[22]近四十年後，同樣期望建立近代政治的張純明，卻提出質疑。他說過去中國經濟交通條件不備，中央控制其實極為

鍾誠、袁剛則單就《中國政治二千年》立論，分析亦不完備。鍾誠、袁剛，〈政治學何以「本土化」——評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第 13 卷第 6 期（2009 年 6 月，北京），頁 107-112。

21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60。

22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1901）、〈新民說〉（1902-1906）、〈新史學〉（1902），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1 冊，頁 422；第 2 冊，頁 663-664、737。並參考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 2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薄弱，「專制的君和統一的天下無疑地成為秦漢以後中國政治的理想和典型」，但「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23]

從系統的眼光來看，專制一統非徒政治思想問題，而是能力問題：中國政府與社會長期缺少堅強的連結。這來自他在地方調查所見，基層政治組織之鬆散使他察覺，問題不在論辯政治思想，也不僅是移植西方制度，而是中國尚未存在有效運轉的政治體。

張氏於 1933-34 年調查河北縣政，1936 年復考察江蘇、浙江、江西保甲制度。晚近地方行政之荒廢，讓他嘆息：比起在首都編寫各種計畫，重建縣政府更為重要。[24]他指出：一、縣政府不斷擴增，毫無系統，各地稅收竟從數十到上百種。[25]二、省縣分工不清。省權力太大，縣事事請示，政務成了文字作業，政策無從推動。[26]三、縣政府與地方社會聯繫薄弱。交通困難，民眾缺少參政意願，寧願不被打擾。這塊薄弱環節沒有正式制度，書吏糧差未納編制更導致腐敗。[27]

這些問題來自傳統制度之鬆散，也因新式政治在舊有機制上帶來新的破壞。保甲制度實施後，縣長、區長、鄉鎮長、聯保主任依次督導，政府與基層表面聯繫更緊密，實際反與地方社會疏遠。過去民眾無組織，有了保甲，政府反而濫用。如江蘇蕭縣，一年修築公路 370 公里、植樹 30 萬株，更辦理徵工浚河、土地陳報、查緝煙毒、識字教育、設立守望所。保甲長事務繁多、地位低微、經費自負，政令難以一一遂行。家境好、能力強者尚能應付，其餘既被政府申斥，又被鄉人指責，乃有童謠傳唱「保甲長，腦袋癢」。公正士紳不肯擔任，任由土豪劣紳出入其間，反成新政障礙。[28]

---

23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15。

24 Ch'un-ming Chang, *A New Government for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Aspect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6), p. 50.

25 Chang, *A New Government for Rural China*, pp. 24, 27, 33-34, 47.

26 Chang, *A New Government for Rural China*, pp. 30, 48.

27 Chang, *A New Government for Rural China*, pp. 27, 41.

28 張純明，〈現行保甲制度之檢討〉，《行政研究》第 2 卷第 3 期（1937 年 3 月，南京），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結果是，地方民眾不僅「不知有國家」，也不知有朝廷，只知有書吏糧差聯保主任。眼見舊有組織之鬆散，新政治制度之破壞，他寫道，「實際上西方所謂『政權』在中國並不存在」。[29]乍看之下，「政權不存在」接續了梁氏「不知有國家」之嘆，晚清以來論辯，卻在此轉換了主題：不單是選擇何種政治理想，而是如何建立有效制度，使政府與社會能夠真正聯繫。

民國之初，梁啟超倡導「強有力之政府」，期望少數菁英帶領，開展政黨內閣，建設新國家，以保育（干涉）政策，範鑄斯民，讓革命後搖離飛動的國中分子回復秩序，將專制下缺乏公共心、散漫無紀的國民「打成一丸」。但從政經年未有所成，終使他反思國家主義主張往往與國民無關，是「一條錯路」，並重新評價「不干涉主義」。晚年更提及晚清以降「官辦的自治」代大匠斫傷其手，鄉治精神泯然。[30]多年過去，在張純明的調查中，其擔憂化為現實，新政府雖略具規模，新政對地方之破壞卻也進一步浮現。儘管梁氏留下之線索未受時人注意，張純明重新思考政治變革，提出修正，隱然間亦有若另一方向的繼受。於此，他的目光從新制度引進，轉向舊制度的分析。

（二）無為政治的歷史、系統分析

重心放在「政府—社會」之聯繫，使張純明對傳統政制有了新的觀察。政制並非單獨存在，而是與社會相對應的歷史產物。這使得傳統政制成為可被分析的知識對象，而不只是被否定的存在。

頁 220-222、227-228。

29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8。

30 梁啟超，〈中國立國大方針〉（1912）、《歐遊心影錄》（1918-19）、〈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1921）、《中國文化史》（1927），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4 冊，頁 2488-2507；第 5 冊，頁 2979；第 6 冊，頁 3345；第 9 冊，頁 5107-5109。梁氏晚年對傳統政治顯示出新的興趣，除稱讚「不干涉主義」雖無「積極的改良」，但有「消極的節制」之價值，並著有授課講義《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於未完成的《中國文化史》更具體討論鄉治制度，惟不久便去世，未及進一步開展。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角度下，近代西方政治觀念並非絕對，而是參照的知識資源。他引用此前客座南開大學的英國社會經濟史學者唐內（R. H. Tawney, 1880-1962）之語，「如果一個歐洲人對於中國人所表現的守舊性不能了解的話，他倘能和他的祖宗見面，一定要發生同樣的感想」，[31]指出西方近代政治同樣經過歷史演變，經濟進步影響社會政治，商業發達促成中產階級與民族國家，才使「整個的政治觀念，法律觀念都改變了」。[32]

於此，他對傳統「無為政治」提出分析，指出中國的政治組織與社會習慣都因應著這一理想：

> 我們沒有濃厚的國家觀念，堅強的政治組織，……我們舊社會的政治理想不是干涉而是放任，不是積極有為而是消極無為，不是為民興利而是與民休息。在這個社會裡風俗習慣代替了法律，紳士代替了法官，除納稅上糧外，人民與政府很少發生直接關係。[33]

正是此歷史制度遺留，使得當下的需求——政府與社會發生直接關係——無法得到配合。

「無為」一詞來自中國傳統思想，但透過西方政治學視角，考察政府－社會的關係，張純明對此賦予了新的分析意義。數年之前一場圍繞新政加重農民負擔的論辯，正可參照。一方以胡適（1891-1962）為主，認為中國農村凋敝，此時當援引漢初先例與民生息。他說有為政治需要人才、資金，有待無為政治休養整備。蔣廷黻（1895-1965）等人則支持有為政治，認為無論內部經濟發展、外部國際地位，都要靠建設；弊端之發生，在於缺乏經驗、執行失當，而非建設本身有錯。[34]

---

31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2。

32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5。

33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8。張並透過歷代循吏傳，考察傳統政治理想。Ch'un-ming Chang, "The Chinese Standards of Good Government: Being a Study of the Biographies of Model Officials in Dynastic Histories,"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8:2 (1935, Tianjin), pp. 219-249.

34 相關討論眾多，從 1933 年延續到 1934 年，見諸《獨立評論》與《大公報》。代表文章如胡適，〈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為的政治〉，《獨立評論》第 49 號（1933，北平），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純明儘管與蔣熟識，當時並未參與論辯，經過幾年調查研究，才從另一面提出無為政治的分析。兩相比較，問題便顯豁可見。如同梁啟超對國家主義的討論所呈現，晚清以來，援引中西思想討論干涉與放任主義的文章為數不少，但多偏重理論方針，輕於具體施行。[35]上述論辯一方面呈現出以具體政策效果作為立論根據的新變化，另一方面，不論支持傳統無為政治休養生息，或要趕上 19 世紀以來西方的有為建設，雙方仍是在思想上劃定主張，未就實際政治制度、組織的運作進行探討。結果討論雖熱烈，但建設必要與無為休養各有道理，都不能說服對方。不同於此，張氏所關注的是政治制度如何轉型。雙方僵持，乃於焉破解。問題並不在選擇無為或有為政治，而在過去因應無為政治理想形成的政治制度與組織，並不適用於推動有為政治的新式建設目標。因此，需要去認識舊有政治制度，以找出變革癥結。

透過外部西方政治學眼光，反思內部中國新舊交替亂象，他就此對舊有體系做出全面考察，尤其關注「政府—社會關係」最直接的基層行政。他以新的知識架構，分析傳統士大夫的省察與新發掘的材料。除自身調查，他更引用了黃宗羲（1610-1695）、顧炎武（1613-1682），實務的汪輝祖（1731-1807）、胡林翼（1812-1861），洋務派馮桂芬（1809-1874）等人，乃至雍正到光緒朝上諭和描述海關書吏的小說《廿載繁華夢》。[36]

這一架構以「有為」、「無為」對比，說明了中國政制諸多費解之根源。一、中央政府：無為政治理想是政簡刑清，六部所轄不過官吏銓敘、兵財充實、宮殿築城、貢舉、罪囚裁判，不涉人民福利，直到晚清

2-6；蔣廷黻，〈建設的前途不可堵塞了〉，《大公報》，1934 年 3 月 11 日，第 2 版。胡適稍早已論及陸賈持積極人生觀，卻應時而發，主張無為政治。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上）》（1930），收入氏著，《胡適作品集》第 21 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 171-175。

35 關於中國應採取干涉抑或放任，梁氏思考前後變化，見梁啟超，〈干涉與放任〉（1902 年）、〈中國立國大方針〉、〈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1 冊，頁 383-384；第 4 冊，頁 2488-2507；第 6 冊，頁 3345。

36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42-58。

臺灣大學圖書館

才因新需求添設。又因各區經濟相對獨立，不少中央組織依照地域設立，亦到此時才改以功能區分。但新組織增設過程，卻又破壞舊有文官制度，任用不遵程序，組織也因此紊亂。[37]

二、地方政府：哪些政務自行處理，哪些該陳請審核？界線不清，無為政治下問題較少，有為政治時卻困難重重。職權上，省事事過問，縣之庸者奉行故事，賢者無以展才。財稅上，固定財源為省佔去，縣只有寄望附加與雜捐，更難推行縣政。[38]

三、各級政府之間：無為政治，官員不習政事，不得不假手幕僚書吏。嘉慶後幕道敗壞，各級各地師爺互相聯絡，隻手遮天。書吏進退更自成系統，有若世襲。民國後，雖訂定各級政府組織職權資格，但未確立文官制度與分級負責，遺跡仍在。官員時常流動，成了科員政治，科員又無法負責，新政推動乃成公文政治。長官心血來潮興造計畫，下屬虛文應之，日日辦交代，月月造表冊，一切政務卻告停頓。[39]

四、政府與基層社會之間：地方書吏上下其手機會更多。他們不屬正式編制，卻隔絕官民，使政府明知弊端而不能改。張氏自身調查，便見各地縣府人員多有前清書吏，地方當局稱「徵冊皆在此輩手中，如果政府不用他們，則錢糧就無法徵收了」。[40]

貫穿分析，「有為」、「無為」對比，不僅是政治理想差別，更影響具體政府組織，形成一種從簡體系。各級政府看似制度井然，又留下許多空隙。前者維繫制度內部不墜，後者卻讓制度實情分為兩截。他特別引用英國政治學者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 1883-1950）對中央集權下地方政治的分析，稱之為「外鑠而非由內發的施政（administration from without）」。這種有限管理，目標是統一而非面對變化，儘管方便

37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23-27。

38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33-37。

39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47、52-57；張純明，〈論政治設施應制度化〉，《新經濟》第 1 卷第 10 期（1939，重慶），頁 268-270。

40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57-58。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有效，卻無法回應地方社會意見、激發人民參與。[41]從中，他看到傳統制度原有規章日益凌亂，缺點更因新要求而放大。無為政治下，鬆散體系尚可容錯，到了有為政治，新的增設若不能洞察舊有制度問題，便越增加體系負擔。

（三）近代政治與中古社會的悖論

將政制看作與社會相連的歷史產物，使他一面肯定其過去存在意義，另一面則證成變革的必要與可行性。經過分析，張純明認為必須重組政府，使之有能力回應民眾的需求，而不再只是老百姓「不可避免的禍害」。[42]針對舊有系統癥結，他提出建議：一、中央政府確立文官制度與分層負責，以系統角度重組制度，再藉制度改變官員運作。[43]二、劃定省縣財源與權限，使雙方各自發揮、推動政務。對於縣政，省只監督與建議，而非事事干預。[44]三、重建縣政府，訓練新的行政人才，給予職務保障、合理薪水，防止貪污。[45]

只是在此，伴隨中央到地方環環相扣改革，一個悖論也在《中國政治二千年》後半到來。重組各級政府後，「政府—社會關係」是否便得到解決？前面他已注意到西方近代政治發展有經濟背景：工業化社會組織緊湊，人際密切，合作精神充足。而中國問題正在於此：經濟制度大體未脫中古色彩，導致政治表面是新的而實質是舊的。[46]那麼，在中古社會與經濟上，能否建立近代政治？對此，他寫道：

> 這並不是說我們的生活習慣在未工業化前不能變改。這種說法就等於承認在最近二三十年以內中國的政治根本不能走上現代化的路

41 Chang, *A New Government for Rural China*, p. 42; 此分析借鏡自 Harold Joseph Laski, *A Grammar of Politics*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25), p. 412.

42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24。

43 張純明，〈論政治設施應制度化〉，頁 270。

44 Chang, *A New Government for Rural China*, pp. 48-50.

45 Chang, *A New Government for Rural China*, pp. 47, 50.

46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60-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上。……無疑地在經濟現代化的狀態下，政治現代化的進度自然可以加速。但以中國的情形論之，除非政治能上軌道，經濟發展的前途不無嚴重的障礙。……事實不允許我們把經濟政治建設分為截然兩事而規定先後的程序。[47]

這段話展現了張純明政治學分析的精彩、誠實與無可奈何下的奮鬥之情。但答案——改造生活觀念以改變政治風氣——卻不若該書前半有說服力。

以貪污為例，他指出晚清以來政府建設、經濟事業開展，機會增加，貪污風氣更加嚴重。這既來自傳統政制不備，也關乎社會因素：農業社會發財機會有限，政治成為唯一營利場所，加之中國家族制度，個人要負擔全家甚至親戚鄉里，都使官吏欲廉潔而不能。然而，除了修正財政制度、改善待遇、給予文官保障，並以法律嚴懲，他也承認制度改變效用有限。結果，最後答案只是與社會組織分析無關的改變社會心理：「我們應該疾惡如仇，愛善如命。」[48]

從基層調查出發，回到重組政府組織，卻又止步於政府與社會的連結，從歷史制度演變分析展開，卻又歸於非歷史的道德觀念改造——與其說這是理論的悖論，毋寧說這是超出理論的課題：近代西方政治學原本便不是為非西方國家轉型而建立。

從政府組織擴展到社會組織的變革，對這未竟的環節，張純明沒有找到合適的答案，但顯得已有所覺察。儘管相當簡略，他在餘論勾勒了未來中國政治的藍圖，那既是期盼，也揭示著尚待探討的課題：

> 國家是不能離開人民的。……每一個國家都包括有「強制」和「同意」（coercion and consent）兩方面。……專制或獨裁的國家裡同意的強度比較小，方式比較消極。……民治的國家裡同意的強度比較大，方式比較積極。……中國……人民素無政治興趣。……「帝力何有於我」的心理是一種消極同意的心理。……此後的國家不能完

47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61。

48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69-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全建築在消極的同意上。我們如果要國家興盛起來，人民對於國家積極的擁護也是不可少的。[49]

他寫道，「提高人民的政治興趣」，「是我們政治上一件最基本的工作」。[50]

二、錢穆：從史學重探傳統「政府—社會」之聯繫

約略同時，錢穆抱持對中國歷史的溫情敬意，亦從另一角度反駁專制之說。相對張純明筆下傳統「政府—社會」之間連結的薄弱，他指出其間實有一理性精神：以學術文化為指導，士人階層以「學治」連結了政府與社會。[51]

此前學界對「學治」已有豐富研究，惟多從文化精神探討；[52]具體制度，則著重中國傳統職分型態政制分析。[53]錢穆如何藉此回應當日現實政治，思考又如何轉折，仍少關注。本節指出，正是有為政治下連結「政府—社會」之迫切，促成「學治」構想之開展，由此對新式政治提

---

49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80-81。此處 consent，張純明譯為同意，將通常用於動詞的「同意」作名詞用，或可譯為「共識」，較易理解。

50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頁 82。

51 錢穆用詞包括學治、士人政治、士人政府、文治政府，涵義相近。

52 如指出錢穆「深信儒家政治理論有一個合理的內核，可以與現代的民主相銜接」，見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頁 52。對錢穆理想「真理的終極來源在教育界與學術界」之強調，見黃克武，〈錢穆的學術思想與政治見解〉，《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15 期（1987 年 6 月，臺北），頁 403-405。並參考林志宏，〈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205-218；陳以愛，〈錢穆論政學關係〉，《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2 年第 2 期（北京），頁 154-178。其中林志宏注意到，錢穆以中層階級協調國共「領袖建國」、「民眾建國」主張，指出「學治」反映知識分子參政心態，深具啟發。

53 甘懷真，〈皇帝制度是否為專制？〉，《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第 4 期（1996 年 9 月，臺北），頁 41-49；閻鴻中，〈職分與制度——錢賓四與中國政治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 38 期（2006 年 12 月，臺北），頁 105-158。

臺灣大學圖書館

出深刻批評與建議；但近代政府功能擴展，卻又衝擊學術與知識分子之獨立。這一構想終未果成，其內在緊張，體現了借鏡傳統資源的洞見與限制。

（一）連結傳統「政治—社會—文化」的理性精神

「學治」起自反駁專制之說，歸結於「政治—社會—文化」制度的整體思考。錢穆首先在 1939 年的《國史大綱》，指出傳統政制合理性。他將中國政體演進分為三段：一、由封建而統一，二、由宗室、外戚、軍人組成變為士人政府，三、由士族門第變為科舉競選。這一過程，政府組成基礎逐漸向社會開放，官吏考試與銓敘，都「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皇帝所不能搖，宰相所不能動」，具體政事復有宰相參署、定額稅制、審駁、監察、彈劾、史官，非一姓一家所能專制。[54] 他寫道：

> 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歷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55]

看似偏向傳統派立場，這一分析實則以新方法回應新的問題。1941 年，馬一浮（1883-1967）邀約錢穆演講便是一例。馬主持復性書院，一向禁談政治，錢穆卻以此為題，他說：「國人競詬中國傳統政治，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帝皇專制，余竊欲辨其誣。」馬大喜，「自梁任公以來，未聞此論」。[56]這段對話顯示西方「國家」概念傳入中國後，傳統派學人逐漸退縮到道德心性，難以回應新派對傳統政治的批評；[57]也呈現錢穆與傳統派、新派雙方距離。不若傳統派預立價值，他從制度具體運作

54 錢穆，《國史大綱》，頁 36-37、446。

55 錢穆，《國史大綱》，頁 37。

56 錢穆，《師友雜憶》，頁 246。

57 晚清知識分子援引西方國家概念，提出「中國有私德而無公德」，重構傳統道德，終致從修身到治國的傳統進德步驟斷為兩截。見黃進興，《從理學到倫理學：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臺北：允晨文化，2013），頁 100-152、194。

臺灣大學圖書館

分析，探討其中合理性，從而能基於傳統學術反駁新派。前述理性精神，並非空懸思想，而是根植於有機整體的國族歷史演變。錢穆強調，「一國家一民族之政治，乃其國家民族全部文化一方面之表現」，「自有淵源，非可貌襲而取」。[58]儘管他與張純明學術脈絡一舊一新，卻同樣採取新的歷史、系統分析視角。

這一新的視角，也引發自新派、左派對傳統的整體性批評。在《國史大綱．引論》，錢穆再三指向專制政體、中古時期學術、封建社會之說。[59]這些解釋比附西方概念，簡化中國歷史，讓他深感困惑，從傳統學術予以反駁；反駁過程，復使他將傳統士人片斷反思匯為系統分析。

1942 年他進一步探討前述政府組成開放的意義，考察其文化、社會基礎，更清楚體現這一反駁新說，又重估傳統的取徑。他以先秦政教分離、學術代興，對比歐洲政府、教會相爭，指出政治背後的文化要素。他說，古代巫史掌握天道，君王倚之治國；後世儒學興起，天道歸於儒者，君王乃借重大儒。皇帝雖尊，政府之運作精神實在由教育傳承的文化：

> 天子擁其尊位，政府掌其實權。政府百官之推選，則一本於學校，學校之教一本於道。[60]

這一政府成員的社會基礎，則是受此文化薰陶的士人階層。他指出，這是一個非宗教、非封建、非專制、非商業資本的中層階級。他們在經濟上耕讀傳家，在宗教信仰上則是儒家思想與家族觀念：

> 此即後世之所謂「鄉紳」與「讀書人」。……融歷史、民族、傳統文化與小我生命而為一。[61]

政教關係之變遷、士人階層之屬性，這些討論顯示出西方概念的影響。

---

58 錢穆，〈中國傳統政治與儒家思想〉（1941 年 10 月），見《政學私言》，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0 冊，頁 123、124。

59 錢穆，《國史大綱》，頁 30、36、39、44。

60 錢穆，〈中國傳統政治與儒家思想〉，頁 136-137。

61 錢穆，〈中國社會之剖視及其展望〉（1941 年 11 月），見《政學私言》，頁 1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同時，政治制度、學術文化、社會階層三者合觀，又提出中國歷史獨特的政制型態：士人階層及其文化貫穿其中，與政府密切相連。這既反駁了新說，並使他的政制分析不限於政府組織，而較張純明更往前一步，看到張氏在「政府—社會關係」薄弱之處未注意到的文化連結。

透過系統分析，錢穆「於舊機構中發現新生命」，[62]一面指向歷史制度，另一面則指向當代問題。傳統政府與社會如何連結？背後有什麼樣的理性精神？此後應當如何？細察「學治」之提出，多處可見錢穆對新式政治之回應。他比較東西歷史，指西方國家起於軍事征服，上下對立，而有立憲、國會、君民契約；相對於此，透過士人階層文化之連結，除元、清外族入主，中國君臣上下近於一體。[63]對照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理論，他認為若西方政治權來源為民眾之契約，則中國在民眾之信託，[64]據此提出「中國式之民主政治」，以尋求中國此後道路：

> 中國政府早已全部由民眾組織，……則政府一切法制章程，即係民意之產物。……蓋中土以「學治」，而西國以「黨治」。……各自有其傳統相沿。[65]

在此，「中國式之民主政治」一詞，作為歷史分析與當代問題的交會點，其複雜構型與新派之批評，適體現出新式政治轉型之困境，與「學治」之洞見。連結「政府—社會」之關注，使錢穆採用西方「民主」一詞，亦使批評多聚焦定義。政治學者蕭公權（1897-1981）便質疑：「專制」意謂君權凌駕制度，不受明確限制，中國傳統雖有限制（宗教式天譴力量；國家成法、祖宗家法；相權、諫官、選考等制度），卻徒具精神，實效有限。[66]其批評可謂深切，但錢穆關注實不在西方政治主權概念，

62 錢穆，〈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1945 年 3 月），見《政學私言》，頁 12。

63 錢穆，〈東西政治精神之基本歧異〉（1942），見《文化與教育》，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1 冊，頁 40-45。

64 錢穆，〈中國傳統政治與儒家思想〉，頁 135。

65 錢穆，〈中國民主精神〉（1942 年 2 月），見《文化與教育》，頁 114-118。

66 蕭公權，〈中國君主政體的實質〉（1945），《憲政與民主》，收入氏著，《蕭公權先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在傳統中國政府與社會如何連結，能否作為新政制基礎。另一方面，當蕭公權面對現實改革，其實亦不能免於政府、選舉等有形政制之外的社會課題。蕭氏倡議憲政，又感民眾缺乏理智修養、自治經驗，驟然嘗試，成效必緩，但終無好方法，只能回答「只要我們要民主，選定了這種生活方式，踏實做去，我們便會有民主」。[67]面對連結「政府—社會」的同一時代問題，卻沒有合適概念以對話，正顯示中西政制差異下探索之不易。

（二）「學治」方案與近代政治的緊張

1945 年錢穆發表一系列文章，涉及中央選舉、地方自治與教育體制，以「學治」回答「政府—社會」連結的現實問題，進一步開展具體方案，既點出當時中國政治轉型討論盲點，也揭示出近代政治目標轉變下，「學治」的限度與內在緊張。

現代政治變革中，「政府—社會」如何有效連結？抗戰勝利前後，各界高呼制憲民主，錢穆寄予期望，卻也感到憂慮。他說，民初黨爭記憶猶新，中國民眾組織能力不熟練，呼籲政府不能「貪還政於民之美名，冒輕率嘗試之實驗」。[68]他指出，中西政制歷史演變相異，西方社會有資產階級培養政黨，向政府爭政權；中國民眾無產，有待好政府襄助造產，社會並無資本，無法「自下而制上」。這將造成政黨盤踞政府，以公帑植私門，「憑在上之力而制下」，走向一黨專政，敵黨亦急於奪取政權，最後由黨爭而革命。黨人只佔中國國民一小部分，代表不了民意，但若無政黨，民眾又散而無紀，不成國是，形成兩難。他說，中國當「自適國情，自創一新政制」。[69]

生全集》第 8 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頁 64-77。

67 蕭公權，〈施行憲政之準備〉（1936 年 5 月 2 日）、〈說民主〉（1947），收入氏著，《憲政與民主》，頁 21、182。

68 錢穆，〈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頁 16。

69 錢穆，〈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頁 2；〈選舉與考試〉（1945 年 4 月），收入《政學私言》，頁 33-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錢穆所見近於蕭公權兩難，答案卻不同。他認為，新政制不在民主之高調，而在以國情選拔賢才、平衡政權。[70]取法歷代修訂法律政典多從民間選才，他認為當以考試限制被選舉人資格，多採特設機關、法人之間接選舉。[71]憲法五權，考試、監察、立法、司法四權獨立於政黨政治，以傳統政治中賢能代表、直接民權精神，選拔少數黨及無黨派人才。僅行政付之國會多數黨，達到超越黨派的全民政治。[72]

「學治」既涉及政府與社會組織，也透過學術文化連結，三位一體，使政治保持平衡。如此，錢穆以具有共同思想文化的大小社會菁英，填補單靠政制變革不能回答的上下連結問題。

但近代政府介入社會的擴展，也使「學治」產生內在緊張。錢穆對地方自治與教育獨立看法的變化，便體現了這種緊張。1943 年，他提出重建農村，以確立民主政治。此構想根植宋代以來保甲、社倉、書院傳統，為私有公耕的集體農場輔以工業、學校、公共設施，乃至自衛軍隊。他說，戰亂之後正是重建時機，「國家預立規模，因其機宜而整理之，事不甚難」，「夫中國，農國也，農之病在於散。中國之離封建也遠，民之散久矣」，有賴公共社會生活，訓練公心，導民從政，「而後可以有政治之真民主」。[73] 1945 年，他進一步將之與選舉制度相連，指出高論民主卻忽略地方與下層，不過為競利夸權者藉口。他建議取法漢代地方政府、宋明地方自治，深植基礎，再上映於整個政治，以自治單位為選舉單位，去私去我、尚公尚群，排除資本操縱選舉之富人政治與反動激起之無產階級專政。[74]

然而，民間既缺少組織，地方自治有待政府介入督導，政府與社會矛盾亦於此浮現。儘管錢穆強調地方自治並非上下爭衡，「自上言之，

70 錢穆，〈選舉與考試〉，頁 35。

71 錢穆，〈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頁 14；〈選舉與考試〉，頁 35。

72 錢穆，〈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頁 15、17。

73 錢穆，〈農業國防芻議〉（1943 年 8 月），收入《政學私言》，頁 175、179-180。

74 錢穆，〈地方自治〉（1945 年 6 月），收入《政學私言》，頁 52-55、6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乃對下一種教育而非手段；自下言之，乃對上之一種義務而非權利」，[75]其憂慮卻多處可見。他也不斷說政府當「權能分職，無事乎多為牽涉，多設猜防」，強調教育不可由國家嚴格統制，導致法西斯集中訓練流弊，「必有士人與自由思想，地方自治乃有靈魂」。[76]最後，他甚至在制度上設立國家文化學院、最高國防研究院、中央科學院，欲「全國政事，由此三院會議發號施令，以學術關係代替官僚組織」。[77]

這一內在緊張所面對，正是張純明指出「無為」到「有為」政治的變化，也是「學治」概念最深刻與艱難之處。政治目標轉變，突顯出社會組織鬆散，有待政府介入。但不同於張氏，錢穆指出其間連結並不那麼薄弱，傳統制度的士人階層，正可作為政府介入基礎，並有制衡政府的作用，避免專政與黨爭。只是，在此過程中，他們過去託身的社會、學術制度卻又因此為政府力量籠罩，逐漸失去獨立性，難有發揮。

當「學治」用於現實，清楚點出政制轉型缺失，卻也突顯其限制。過去學者多已指出錢穆「道統尊於治統」構想，但少留意到其為現實政制而發。而回到當時脈絡，錢穆正是察覺政府介入之必須與危險，乃生「學治」之呼籲。1942 年，他回顧人文自由教育與國家教育相爭之傳統，著眼教育獨立方有高遠理想與學術人才，以備國家社會真實之用，而非晚清以來上下功利唱應，只重技術實用富強。[78]到 1945 年，他的關注卻轉向近代政府的思想壓制。他強烈批評《五五憲草》國家監督全國教育機關條文，指出「近代政治，率常操於政黨之手，又濟之以所謂宣傳者」，假使「教育與宣傳相配合，政治之力將莫與競」。[79]他因而高呼：

> 學術必先獨立於政治之外，不受政治之干預與支配。……學術者，

75 錢穆，〈地方自治〉，頁 64。

76 錢穆，〈地方自治〉，頁 62-63。

77 錢穆，〈地方自治〉，頁 65-66。

78 錢穆，〈中國傳統教育精神與教育制度〉（1942 年 2 月），收入《政學私言》，頁 217、223。

79 錢穆，〈道統與治統〉（1945 年 8 月），收入《政學私言》，頁 91-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乃政治之靈魂而非其工具，……乃有當於學治之精義。[80]

在時局下，錢穆終於確立，「學治」不僅在政制上的士人從政、職清養士，更在社會中獨立於政府的教育自由。[81]在此，「學治」構想幾近完成，也顯現出實踐之難。

（三）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的分離與知識分子的飄零

如何面對這一內在緊張？此後錢穆減少現實政論，未見進一步提案。1949 年政局易勢，其關注從亡國轉向亡天下，更著重傳統學術思想傳承。不過 1950-51 年幾篇文章回顧近代變化，仍留下線索。

不若 1945 年期望抗戰勝利後國家建設，錢穆在中國政治、社會天翻地覆的 1950 年，將「學治」重心放到知識分子與社會的聯繫。他說，科舉制度取消造成巨變，知識分子無處安身，中層階級崩塌，終致政治與社會分離：

> 晚清末年取消自唐以來綿歷一千年的科舉制度，而西方民主自由的地方選舉急切間未能學得，於是政治失卻重心，……作為全國中層階級指導社會的智識份子，長期在搞黨與革命兩條路上轉側徘徊，非此則沒有他們轉上政治的其他門路。黨的支撐，則不在民眾而在軍隊。因此黨爭即就是革命。……政治脫離了社會，沒有安定的重心。社會脫離了政治，沒有集中的領導。政治動搖，社會沒有力量控制。[82]

這既破壞「學治」社會基礎，復使學術無力影響社會。新式教育以留學為門徑，各國政俗不同，留學生不知本國沿革，對變局缺乏整體認識，帶回新制雜湊安排，終致「國內對國外歸來者失望，國外歸來者也同樣

80 錢穆，〈道統與治統〉，頁 88。

81 錢穆，〈道統與治統〉，頁 87-89。

82 錢穆，〈中國社會演變〉（1950 年 10-11 月），《國史新論》，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30 冊，頁 33-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國內的失望」。[83]

結果，缺少傳統文化薰陶的一批人取代士人階層，登上舞台盲目爭權，更加劇政府與社會之斷裂。他指出，中國傳統政民一體，人物內傾，著眼從政之負責與信託；西方政民對立，人物外傾，強調政權之爭取與監督。然而中國重一統法制，桎梏既久，變革之際，難如西方政黨平心商榷。外傾人物積極爭取政權，要「由革命來痛快剷除一切，再痛快建立一切」。內傾人物雖欲負責，卻不免淘汰。辛亥以後，政治在理論、精神上都走向外傾。他嘆息道：「應該有一個超政府的外在力量來監視而控制它，而實際上則並無此力量。於是中國政治遂急速腐化，即不負責任。」[84]

錢穆期望的出路，仍在知識分子自身。相較此前強調傳統政治之政民一體，這時他更加著重「政府—社會」之緊張，及知識分子之轉變。他說，唐代以後科舉開放政權，教育機構卻未配合，反讓不擇手段求官的假士，阻礙以政治推進社會的真士。他特別點出此後「下傾的影響，早比上傾更重要」，明代王學泰州、龍谿一派社會路線為販夫走卒立講，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又一新形態」，若與在野而懷抱傳統上傾政治路線的東林、復社並進，知識分子當仍可在政治社會上發揮力量。於此返顧，他惋惜道，清代以後無論是社會或政治路線，皆受堵塞，未能替新時代預作準備。[85]

經過十年現實激盪，錢穆所關注的對象，逐步由政治制度轉向擔當社會中堅的知識分子。而在近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分離中，當錢穆最終將期許寄予知識分子，他們在新體系中的位置雖來自傳統，意義卻也改變，不再是有機整體中自然的存在，而需要重建。這既是「學治」構想的最後型態，也指向其轉型。而在其中，留下一個跨出傳統政制的課題：

83 錢穆，〈中國知識分子〉（1951 年 5 月），收入《國史新論》，頁 197-198。

84 錢穆，〈中國傳統政治〉（1950 年 12 月），收入《國史新論》，頁 125-131。

85 錢穆，〈中國知識分子〉，頁 183-188。此意十餘年前已點出，惟當時著重宋明理學精神「由士人集團，上面影響政治，下面注意農村社會」之有機一體，尚未強調「政府—社會」之緊張，也未如此沉痛。見錢穆，《國史大綱》，頁 913。

臺灣大學學術發展研究中心

晚清以降，地方社會如何演變？作為昔日菁英，知識分子又扮演何種角色？

「今天……已非智識分子得救與否……，而將轉落到並無真正的中國智識分子存在……。如何來再教育再培植一輩真正的中國智識分子，……成為中國得救與否之唯一該先決的問題。」[86]此後，錢穆致力學術文化傳承，未再涉及現實政論，但這一課題當仍在他腦海中迴盪。多年後在回憶文字，他寫下無錫企業家興辦學校的文化積習，[87]寫下家貧卻持事公正、受鄉里敬重的父親，[88]寫下童年鄉間小學與師長，彷彿提示，彼時在新舊之間的中國地方社會與知識分子，仍充滿可能性，也仍然等待探討：

> 七十年前，離縣城四十里外小市鎮上之一小學校中，能網羅如許良師，皆於舊學有深厚基礎，於新學能接受融會。此誠一歷史文化行將轉變之大時代，惜乎後起者未能趁此機運，善為倡導，雖亦掀翻天地，震動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當歸。[89]

三、費孝通：以功能論連接「傳統社會—近代政府」

張純明從政治學察覺「政府—社會」之間連結薄弱，錢穆從史學指出其間實有士人階層、學術文化的傳統連結，費孝通則以社會學探討這一連結在近代的破壞。晚清以降，家族思想、地方主義被視為現代國家的阻礙。梁啟超區分「部民」與「國民」，強調惟後者「能自布政治」。[90]此後，許多知識分子都著力將一盤散沙的自然狀態，再造為有意識的社

86 錢穆，〈中國社會演變〉，頁 38。

87 錢穆，《師友雜憶》，頁 276-282。

88 錢穆，《八十憶雙親》（1974），收入《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9-13；〈懷念我的父親〉（1986 年 8 月 8 日），《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400-402。

89 錢穆，《師友雜憶》，頁 44。

90 梁啟超，〈新民說〉，頁 6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91] 1940 年代後期，費氏卻提出不同看法：國家和地方對立但也銜接，社會意識需要地方團體支持，必須有計畫地重新認識並恢復這些過去被忽略、甚至破壞的連結。

1947 年，他記述返鄉與父親談話，發現兩代知識分子「對於鄉土的關係上有很重要的區別」。民初，留日的費璞安（1879-1969）回吳江辦中學，疏通水利，組織縣議會。但都市發達引起鄉村衰落，中央集權引起地方自治僵化，他最終失望年老，兒子都出了家鄉，不再回去。[92] 相較父親，費氏寫道，包括他自己，下一代「無處不能駐足的游移分子」，把中國弄成當前局面。半個世紀中，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力量促使地方團體解體，國家團體卻未長成。社會失序，人與人只有利害結合，只是「社區」而不成「社會」。他呼籲，恢復以共同目的相結合、以道義相期待的團體生活，才能改變眼前無所為、無計畫、得過且過的人群，組織現代國家。[93]

1979 年，費孝通脫下右派帽子復出，以關注中國農村工業化的進步學者形象，取代前述探索，刻意淡化 1940 年代後期著作，說那不過是時事評論。[94]這使得他重建「國家—社會」團體關係的思考，隱而不顯。

---

91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頁 202；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入氏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 73-89。

92 費孝通，〈漫談桑梓情誼〉（1947 年 12 月 15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5 卷，頁 466-467。

93 費孝通，〈漫談桑梓情誼〉，頁 468-471。

94 費孝通，〈個人・群體・社會——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1993 年 7 月 24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14 卷，頁 232。在一篇費氏過世後刊出的訪談中，他解釋為何不再提紳權，只談鄉土工業：「不是否定，而是蓋起來了，……我的路子現在看來都有點超前，……得走安全路線。」朱學勤，〈費孝通先生訪談錄〉，《南方週末》，2005 年 4 月 28 日，第 25-28 版。晚年弟子趙旭東也記述曾見費在一本《鄉土重建》上的刪改，「重讀那些段落，似乎相比那些沒有被刪除的段落更會給人以啟發。當然，這言外之意也是能讓人理解的。」趙旭東，〈作為文本存在的費孝通——費孝通先生十年祭〉，《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 年 4 月 24 日，A08 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後傳記，這段時期他的學術與政治斷為兩截。[95]關注自由主義學人的研究，只強調他批評國民黨、期望民主。[96]學術史探討，儘管注意到費孝通以士紳階層連接現代經濟與鄉土倫理，但或著重知識分子「自外而內地幫助農村」組織作用，[97]或強調他為地主階層尋找出路，[98]都忽略費氏關注者，乃在此時政治、社會、知識分子與其承載知識同處動搖，「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已失去了領導社會的能力」。[99]而其構想核心，如下所論，實為學術與政治的結合：以一種新式知識生產，提出有效的社會計畫，重新連結近代政府、地方社會與知識分子。

1940 年，當張純明與錢穆重估專制之說，費孝通仍致力農村經濟社會學調查，七年後，其關注卻轉向「政府—社會」關係與知識分子。他如何走到此處？先前研究多忽略這一轉折，此過程卻正呈現了對錢穆遺留問題之察覺與回答。不同於張、錢從政府出發，擴及「政府—社會」連結，費氏的研究始於無涉政治的農村經濟，但探討傳統社會與外來改革破壞作用，最終仍使他不得不涉及政府角色與「政府—社會」關係。同時，從地方社會出發，則讓他對舊有體系連結運作、近代變化，以及「士紳階層—知識分子」在其中角色，有更為清晰的分析，最終，回應政府介入基層社會問題的兩難，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構想。

---

95 阿古什（R. David Arkush）著，董天民譯，《費孝通傳》（北京：時事出版社，1985；英文版 1981）；張冠生，《費孝通傳》（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

96 如謝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頁 6-10。

97 如王銘銘強調費氏將農民社會理性視為「現代性的敵人」，楊清媚強調其士紳天下觀，均忽略費氏所重在於了解地方機制，方能有現代轉化。王銘銘，〈從江村到祿村：青年費孝通的「心史」〉，《書城》2007 年第 1 期（上海），頁 13-16；楊清媚，《最後的紳士：以費孝通為個案的人類學史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頁 134-137、149-156。

98 張馭中，〈1949 年以前的費孝通：一段學術史與思想史的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99 費孝通，〈真知識與假知識——一個社會科學工作人員的自白〉（1948 年 9 月 26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6 卷，頁 291。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面對政府介入兩難的社會科學

1941 年，經過一系列社區調查，費孝通確立了他的中國農村工業合作社構想。1938 年，在英國文化人類學者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指導下，他以江蘇農村蠶絲業田野材料，寫成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從倫敦大學回國後，他繼續調查雲南的內陸農村與戰時新建工廠。相較於左派主張土地改革，留學英美的新派經濟學者傾向技術改良，透過類型比較，費孝通對農村變革提出不同看法，指向中國傳統經濟體系背後的功能配合。

他指出中國農村非僅封閉自給，而多需手工業輸出平衡經濟：地少人多，農民不易單靠土地營生，尚有賴副業。近代以來外貨衝擊，交通越便利之處，手工業越衰落，資金外流也越嚴重。農村金融枯竭，向外告貸，土地流向城鎮地主，業佃乃趨向分化。[100]因此問題不單在農業，而是兼營農業與手工業的農村如何轉型。他建議參照傳統經濟體系，將現代化工業分散農村，以補充農家收入。同時透過合作社組織，提昇經營效率並合理分配利潤。反之，工業集中城市固然效率更高，代價卻是農村的破壞。[101]

1930 年代初期就讀燕京大學社會系以來，費孝通便通過功能論（functionalism）展開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思考：既存社會文化體系有其意義，必須認識各部分功能之配合，作為變革的基礎。不同於左派「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102]也異於新派技術上漸進改良；如《江村經濟》前言所期許，他嘗試提出一個減少破壞舊有社會，同時推動整體變革的觀點：

> 社會情況通常是複雜的，參與改革的一個個人，他們的期望也可以

100 費孝通，〈中國鄉村工業〉（1941 年 9 月），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2 卷，頁 339-349。並見費孝通、張之毅，《雲南三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101 費孝通，〈中國鄉村工業〉，頁 349-355。

102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收入氏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頁 31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各不相同。……如果要組織有效果的行動並達到預期的目的，必須對社會制度的功能進行細緻的分析，而且要同它們意欲滿足的需要結合起來分析，也要同它們的運轉所依賴的其他制度聯繫起來分析。這就是社會科學者的工作。[103]

然而，當構想初步成形，費孝通也開始需要面對錢穆遇到的同一問題：「政府—社會」之間的緊張。工業合作社並非農村能夠自行推展，需要政府的協調力量；但有為政治下政府權力擴展，卻並不一定能夠認識舊有體系，反而可能更加破壞地方社會原先的運作。馬林諾夫斯基在《江村經濟》序言，期望費孝通實踐他未及開展的構想：不再是外人考察部落，而是本地人研究複雜國家，進一步涉及文化傳播以至社會工程。[104] 這卻也指向功能論在西方尚未觸及的課題：文化變遷中，如何定位政府介入？

政治問題於此進入費孝通視野。他的報刊文章，逐漸從田野心得、制度建議轉向政府失能。他寫道，戰時貧富差距擴大，造成一般人不能容忍的不均，破壞「正當生活標準」的觀念，將成「社會組織崩潰的起點」。[105] 1942 年，他與西南聯大教授聯名提出〈我們對於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希望政府負起經濟行政責任。[106]

不像其他新派學者強調澄清吏治，[107]費孝通察覺，這涉及政府如何認識複雜社會，而中國政府對此並未做好準備。他批評政府隱瞞通貨膨脹資訊。他說，近代以理性控制自然，卻因社會機制複雜，人們只能感

103 費孝通，《江村經濟——長江流域農村生活的實地調查》（1938），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2 卷，頁 70-71。這本博士論文於 1939 年出版英文版，中文版則在 1986 年。

104 馬林諾夫斯基，〈序〉，《江村經濟》（1938），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2 卷，頁 278-282。

105 費孝通，《內地的農村》，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4 卷，頁 440-443。該書於 1940 年陸續刊載，1946 年 7 月出版。

106 伍啟元、李樹青、沈來秋、林良桐、張德昌、費孝通、楊西孟、鮑覺民、戴世光，〈我們對於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當代評論》第 2 卷第 9 期（1942 年 8 月，昆明），頁 130-135。

107 伍啟元等，〈我們對於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頁 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結果而不知原因，又懷疑理性走入徬徨。要解決這問題，在於了解社會。他呼籲政府，「事實的誠實報導，是理性抬頭的必要條件，善意的公開批評，使人能找到合理的解釋」，以做好戰時心理準備。[108]

建設與戰爭加速社會變遷，加強知識需求，反造成政府隱瞞。費孝通開始感到社會科學與政府之密切，也感到兩者距離。隔年《祿村農田》付印，他特別批評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 1933-34 年的《雲南省農村報告》，指出許多社會調查只是預定表格，僱用調查員填寫，最後由專家統計推論，「用了死的表格來說明活的事實」。他說，行政上分工也許行得通，學術上卻相當危險，政策設計者全靠別人報告，更不易得到所需事實。[109]

過去研究很少注意到這一轉折：相較確立的改革構想，費孝通顯得極為焦慮。1943 年他寫下不少散文甚至科幻小說，矛盾分歧，時而絕望獨裁者將毀去所有知識分子，時而感到現代知識對老農毫無意義，有時高呼建立烏托邦，有時卻湧現隱遁之心。[110]社會知識生產與實際生活的距離、政府對知識的封鎖、民眾因為無法理解社會而蔓延的不安，作為強調實地觀察以修正理論的研究者，他越來越遠離學術獨立，不再能只是從旁建議，而開始思考社會科學家的政治角色。

這些困惑，將費孝通帶向一個與錢穆「學治」有些相似的構想，但又有明顯差異。這個構想更著重地方社會文化功能配合的變革，並不單將希望寄予知識分子，而試圖讓民眾一同參與，去產生新的知識與計畫。1943 年，費孝通訪美一年，觀察思考日後結集成《初訪美國》。過去多視該書為工業文明與鄉土社會的對照，[111]但若連結訪美紀錄重心，與戰後政

108 費孝通，〈神經戰〉（1942 年 8 月 10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224-229。

109 費孝通，《祿村農田》，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90-96。1938-39 年調查。1943 年初版。

110 費孝通，〈最後的一個上帝〉（1943 年 4 月 3 日）、〈編蠅拍的老竹匠〉（1943 年 5 月 15 日）、〈狂者進取〉（1943 年 3 月 20 日）、〈雞足朝山記〉（1943 年 3 月），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285-287、290-291、276-278、270-272。

111 如閻雲翔對比書中西方「團體格局」觀察，指出「差序格局」不僅於關係網絡，亦涉及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出版中心

治轉向，便會看到其中正回應了他對「政府—社會」關係的困惑。他所到訪的，並不是工業文明成熟巔峰，而是經濟大蕭條後，正在求變，「矯正以往的不完全」的美國。[112]儘管經濟發展、社會問題相異，面對資本主義發展下社會分化的美國，卻與現代化轉型的中國面臨相似課題：如何形成一套社會設計的知識與計畫，並動員社會力量使之實現？

美國積極民主之發展，給了他深刻印象：使民眾參與到經濟建設之中，了解自己活動的社會意義。他指出，這是從控制自然到控制社會的轉變。美國曾是一片沃土，資本主義解放個人鼓勵競爭。但拓殖邊界、成為工業大王的時代已過去，產業壟斷，勞資鴻溝，一般人不再保有士氣。[113]這人造的龐大複雜體系要再發展，個人與社會目的之關聯，便不能再委諸自由競爭與上帝，而需要更合理的配合，才能讓人們主動發揮能力。[114]

費孝通特別記下重建田納西河流域的 TVA（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以及鼓勵工人投票的 CIO-PAC（Congress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這兩個組織不只促進地方經濟、維護平民利益，更形成新型態的社會連結：支持並協調小企業參與地方經濟開發管理，[115]提供民眾資訊以理解切身政策，[116]讓民眾將自身經濟生活與更廣大的社會、政治聯繫起來。他寫道：

> 一切計劃是否真正合理，真正對於人民有利，最好的判斷者不是計劃者，而是實行這計劃的人民。……用權力來強迫的話，計劃本身大概頗有毛病。[117]

中國文化等級觀。閻雲翔，〈差序格局與中國文化的等級觀〉，《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 4 期（北京），頁 202-204。

112 費孝通，《初訪美國》（1945），《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505。

113 費孝通，《初訪美國》，頁 434-447、457-459。

114 費孝通，《初訪美國》，頁 458-459。

115 費孝通，《初訪美國》，頁 526-530。

116 費孝通，《初訪美國》，頁 515-521。

117 費孝通，《初訪美國》，頁 5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是，科學知識不再與生活分隔，而能使人相互連結：

> 個人在社會裡的參預，就是充分地承認每個人間的相依性和互相的責任;把個人動作的配合體系貫通於集體活動的配合體系之中。……科學所發展出來人和人的相互性也就是擴大民主內容的力量。[118]

先前逐漸進入文化功能分析的政治問題，於此沉澱發酵，將他的焦慮帶往新方向。對照訪美前後，其自我定位有了很大不同。訪美前夕，他說政治是生活習慣一部分，比起政治改革，更願為文化轉變盡一份力。[119]在美國整理《雲南三村》英文版時，解體社會的重組、政府介入的獨斷、知識與民眾的距離、以及社會科學家的工作，開始連繫起來，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構想。他在新增的結論寫道：

> 把科學研究和實踐政策聯繫起來是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代替中國農民當了原告。在我們陳述了他們的理由……，提出了證據之後，我們就應該呼籲一些實際的行動來改善他們的生活。[120]

（二）認識傳統無形配合作為計畫基礎

在此，從地方社會出發的費孝通，與從政府制度出發的張純明、錢穆，走到了同一個路口。對照訪美所見，美國須從自由競爭走向更合理的計畫配合；1940 年代後半，費氏帶著新的政治、知識構想回到中國，面對破壞甚於戰時的社會與經濟狀況，介入更深的政府，他的分析從出發前的農村社會經濟體系，延伸到傳統中國的政治運作、知識分子與知識生產。

過去多將這段時間費孝通在「中國民主同盟」的政治參與，和其學

118 費孝通，《初訪美國》，頁 456。

119 費孝通，〈我們沒有分別〉（1943 年 6 月 13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297-298。

120 費孝通，〈《雲南三村》英文版的「導言」和「結論」〉（1945），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193-194。原載 Hsiao-Tung Fei & Chih-I Chang,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術工作分開討論。釐清上述脈絡，便可有一新看法。1947 年 7 月，他開始連載《鄉土中國》，先前研究多著重其中對中國鄉土社會的靜態分析。但若參照《初訪美國》，該書其實是對一個變動劇烈社會的分析，試圖在變動中，捕捉過去變化緩慢之際，不太措意的社會制度與連結，作為變革基礎。該書意圖，實在於回應鄉土社會未有的想法：「人類發現社會也可以計劃」，[121]以思索新式「政府—社會」關係。

《鄉土中國》於 1948 年 4 月結集出版時，費孝通補寫最後兩章，正是關於這點。相較前面鄉土社會分析，這兩章指向社會變遷與知識方法論。他引用社會學者孫末楠（William Graham Sumner, 1840-1910）民俗研究，指出人類從試誤決定行為，再以思想保留經驗。過去文化變遷緩慢，由時間選出生活方案，配合有如天工。但當社會變動快速，文化不能滿足，人類便不能不去推求「行為—目的」關係，有計畫地重新連結變動中的要素。[122]

《鄉土重建》對近代中國的速寫，更將此清楚展現：

> 貧窮跟著鄉土工業的衰落侵入鄉村，這個魔手是間接的，impersonal 的，捉不住、看不清對象的，是一種無可抵禦的勢力。……傳統經濟裡早就潛伏著的土地問題暴露了。……地主不會明白為什麼佃戶變了，他還是收取和以往同樣的租額，……佃戶們眼裡的收租者卻變了，成了來要他最後一粒穀的催命鬼——看不見的是沒有聲音的西洋工業勢力，它打碎了傳統有機配合中的一個齒輪，那一個地主本來不關心而其實是保證他們特權的齒輪，鄉土工業。……這樣，……中國的土地問題日深一日。[123]

這一時期他常用「本來不關心」、「無形軌道」等形容，說明過去這些配合是不被注意到的，一面指向傳統變遷緩慢社會，另一面指向新的、計畫性、基於原有機制的知識工作。

---

121 費孝通，〈從欲望到需要〉，《鄉土中國》，收入氏著，《鄉土中國》，頁 66。

122 費孝通，〈從欲望到需要〉，頁 67-69。

123 費孝通，〈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1948 年 1 月 11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1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首先指出，中國經濟舊有平衡遭到破壞而陷入癱瘓。過去商業金融性的市鎮以地主階層收租，軍事防衛性的城作為政治中心徵取稅收，都是消費性格。租佃制度下，農村尚能負擔，端賴手工業維持。西洋工業破壞手工業，打破長期平衡，使財富流向市鎮、城，最後集中到新出現的商埠。不若西方都會、農村經濟分工，商埠卻不足互利農村，輸出的是農村原料與土貨，輸入的是西方消費品。最終城鄉相剋，農村衰落，被供養的商埠也無以為繼。[124]

繼之，經濟「傳統有機配合的脫栓」，又因「雙軌政治」平衡破壞，更形惡化。他分析，中國傳統政治不只是由上而下單軌，而有民情上達的雙軌作為消極防線。中央，皇帝儘管集權，一旦有為超出民力，往往傾覆，形成無為思想。地方，有形政府組織只到縣城，以下士紳主持自治。地方行政分三個角色：差人傳遞官員政令；民眾輪流擔任鄉約，負責執行，並無權力；有權力的士紳作為地方領袖，不直接出面。而當政令不符實情，鄉約被差人關押，士紳便動用社會地位、私人關係和官員交涉。如此顧全皇權，也緩衝了專制。這兩道防線卻在近代破壞。一、公務日漸複雜超出地方，無為政治不再是理想。二、政府轉而有為，推動保甲制度，將差人、鄉約、士紳合為一保長，卻忽略職能差異，導致過去緩衝空間消失。當政令與地方不合，保長應代表民情抑或政令？前者將使士紳與保長對立，政令沒有橋梁；後者則使士紳成為保長，放棄地方立場，不再有緩衝。他嘆息，中央下達政令容易了，但加強的只有要錢、要人，談到建設多與實情隔閡。[125]

地方政治變質，指向第三個破壞：知識分子流動平衡。費孝通分析各省朱墨卷，發現清代中榜士子出身，城市 52.5%，鄉村 41.16%，市鎮 6.34%；再考察中榜者的上一代有無功名，城市比例 68%：32%，鄉間為

124 費孝通，〈鄉村．市鎮．都會〉（1947 年 4 月 20 日）、〈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覆（後記）〉（1948 年 6 月 19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128-130、227-229。

125 費孝通，〈基層行政的僵化〉（1947 年 9 月 23-24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148-152。他的地方行政思考，亦來自學生胡慶鈞田野調查。並見胡慶鈞，〈論保長〉，《觀察》第 3 卷第 17 期（1947 年 12 月，上海），頁 10-12。

臺灣大學圖書館

64%：36%。他指出，傳統中國知識階層並不集中城市。落葉歸根，成名人物將培養本鄉人才視為責任，使文化深入地方，也讓人才來源充沛。[126]現代教育體制卻中斷城鄉流動。鄉村送出子弟，近代西方知識卻不為中國鄉村預備，造就的知識分子，一部分成了城市失業人口，一部分回頭利用新舊文化差異欺壓鄉間。現代教育不但沒有使中國現代化，他寫道，「反而發生了一種副作用，成了吸收鄉間人才外出的機構，……損蝕了鄉土社會」。[127]

舊有體系的配合及平衡為何？新的變遷破壞了什麼？透過上述分析，費孝通在傳統與現代化的連結上，較張純明和錢穆展開更進一步思索。儘管從目前史料，他們之間沒有直接的學術論戰與回應，僅能見到間接的人際聯繫，但共同時代問題下，三人的探索從內部形成了互相關聯的對話。相較於張氏，費氏同樣注意到無為政治，而進一步填補縣政府到地方社會的薄弱連結，指出其間曾經存在有機聯繫；[128]相較於錢氏，費氏將「文化精神」、「國情」做了更具體的功能分析，也就此指出士紳的社會基礎與知識作用，都已脫栓有待重建。[129]在他的分析中，單憑現代化訓練的基層政府人員，抑或未改變的士紳階層與「學治」理想，都不足以回應這個平衡破碎的局面，而有待一個社會計畫工程：以新的知識，認識過去未察覺的無形聯繫，展開有效的制度設計。

126 費孝通，〈損蝕沖洗下的鄉土〉（1947 年 11 月 30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164-165；費孝通，〈科舉與社會流動〉（1947 年 10 月），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5 卷，頁 447-465。

127 費孝通，〈損蝕沖洗下的鄉土〉，頁 166-167。

128 目前未見直接材料證明費、張是否討論過「無為政治」，但《鄉土中國》動筆，起自張為《世紀評論》向費約稿，兩人很可能有過交流。見費孝通，〈後記〉（1948 年 2 月 14 日），收入《鄉土中國》，頁 77。

129 費、錢之間，學術、私誼均未見互動記載。錢穆姪子物理學者錢偉長當時任教清大，與費是同事好友。費或對其觀點有粗略了解。此外，費討論科舉時，提及一種看法是「科舉制度不斷地從下層挑選出人才來送入上層」，使中國沒有明顯階級分劃，此看法與錢穆相近，或可視為一間接材料。費孝通，〈科舉與社會流動〉，頁 4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作為政治方案的知識社會學

如何重建平衡？分析的最後，費氏轉向知識社會學，提出一種重新與政治、社會相結合的知識生產，以之恢復地方知識人才與其社會作用。

從文化功能分析，費孝通首先以一個新的角度分析士紳階層與其轉型，他問道：他們在文化體系中有什麼特質？這使他們在現代化中扮演什麼角色？他對於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有很深的失望，指出他們幾乎未能認識變動社會的知識需求。

他區分兩類知識：利用自然的技術知識、安排社會共同利益的規範知識。相較技術知識與謀生關聯，規範知識需要閒暇學習，而脫離勞作的地主也需社會權威保護地位，兩者配合，「文字造下了階級」，分化了兩種知識。他說，這種社會結構使中國知識分子無法領導現代化。許多人去西方學習技術知識，卻沒有學到技術跟社會的關係。傳統知識階層儘管缺少技術知識，但有適合當時社會的規範知識；他們回國繼承前人地位指導社會，卻沒有適合的規範知識，結果技術無法應用在社會中。「中國的變遷，怎能不成為盲人騎瞎馬？」[130]

但在此，他也期待一種新知識的誕生，要「使知識不成為一個社會階級的獨占品」。[131]他對田野調查所見知識分子與民眾隔閡，做了理論性回顧，呼籲由雙方共同參與知識工作。他指出，近代社會科學仿效自然科學，但有一點不同：研究者介入會影響被研究者。在中國這更為嚴重。科學術語與地方不同，問題對民眾缺乏意義。調查又多由官方聯繫，民眾有防衛心，感到是給拉人徵糧作準備。研究者察覺「農民最不願意將他的祕密告訴你」，調查便成鬥智。他說，這樣研究絕不可靠，研究者要站在「不知」地位向被研究者「學習」，讓後者知道研究對自己有利，「自覺地要明白他們的問題」，一個找一個，互相在理論提示下討論整理經驗。最終，「研究者和研究對象融合」，「理論和事實融合」，

130 費孝通，〈論「知識階級」〉（1947 年 10 月 18 日），《皇權與紳權》，收入氏著，《鄉土中國》，頁 88-95。

131 費孝通，〈論「知識階級」〉，頁 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社會科學才能確立」。[132]

沿著這條線索，「鄉土重建」便不只是 1942 年的農村工業合作社，不單加入紳權地方自治，不僅尋求地主階層出路，核心更涉及一項新的知識工程。他期望地主階層轉型放棄經濟特權，[133]在中國農民與現代技術之間形成謀求共同利益的橋梁。[134]期待下鄉知識分子能如他在英國鄉村遇到的退休醫官所言，「我們不很知道地方上的需要，他們不很知道怎樣才能滿足這些需要，我們一合攏來，地方上的事就好辦了」。[135]當時與他立場較為接近的知識分子，如《觀察》上的作者，在國共之間尋求「第三條道路」，亦期望結合民主政治與計畫經濟，但多在抽象理論層次上論述。與此相較，這一方案則試圖透過有計畫的知識輸入、反饋與共同生產，形成新的地方領袖人才與社會重心，讓包括經濟產業、社會組織、地方自治的農村工業合作社，聯繫地方社區，能夠回應現代國家乃至更廣大的世界變遷。

鄉土重建方案能否有效實行？和地方民眾一同生產的新知識，能否取代試誤與各種新教條？能否避免政府介入的兩難困境？相較於六年前的困惑，當費孝通將政府納入計畫之中，或可說，他將問題化作了答案：如果這個鬆散又存留各種脫栓配合的社會，現代化要有成效，那麼政府將不能倚靠憑空外來的建設藍圖，而需要基於認識舊有社會的計畫。他沒有斷言一個肯定的回答，他既需要有力的政府帶動整個現代化方案，又感到集權的危險。[136]但是，他也顯示出一種期待。他說，如果最終會出現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這種新的知識終究需要，研究不會白費。[137]

---

132 費孝通，〈亦談社會調查〉（1947 年 10 月 10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5 卷，頁 420-427。

133 費孝通，〈地主階層面臨考驗〉（1948 年 2 月 14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184-185。

134 費孝通，〈鄉土工業的新形式〉（1948 年 3 月 9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203。

135 費孝通，〈再論雙軌政治〉，收入《鄉土重建》，頁 157。

136 費孝通，〈節約儲蓄的保證〉，收入《鄉土重建》，頁 216-217。全書出版前未發表，當寫於 1948 年 6 月上旬。

137 費孝通，〈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覆（後記）〉，頁 2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儘管現實中知識分子「被這大社會拋在冷宮裡，說的話都是空的，沒有人聽，更不會轉變局面」，但當秀才負起責任，把「理配合到社會生活」，如同兵不能輕視飛機的知識，知識分子的「理」將可和兵說清楚。[138]

政局日艱，使這一新知識之開展越發困難亦越見清晰。費孝通提出「思想社會化」的思考，與農村工業合作社新定位並行。1945 年前，其研究多只在社會學界討論，這兩年隨寫隨刊，擴及其他學科與一般讀者。他說，工作原本該分三步：一、勾勒基層社會結構原則，二、描繪各部分之配合，三、把傳統結構放入當前處境，找出癥結，提出主張。現實迫切，不得不讓第三步提早一起進行。[139]他不斷提醒讀者這些並非最終答案，只是嘗試的紀錄，[140]「既不成熟又不完整的開端」，[141]只是原則提示，許多問題非就實際情況不能回答。[142]他說，思想社會化激速擴大，自己不過是摸象的瞎子，希望許多瞎子片面加總，能讓共有的知識更完全。[143]

他說，十多年來每個人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戰前各在自己圈子裡，不同學科、不同社會角色的人們，儘管觀點、假設、名詞定義有著距離，但都開始注意「造成這絕境的各種因素」，感到「這是全國人民的共同問題」。[144]雖然其構想未被普遍認同：右派認為他太過激烈，左派認為他太過溫和保守；現代化論者認為農村工業是留戀與空想；傳統派如梁漱溟，則說自己早已提過，並不理解其中新意。[145]但他說，這是「近

138 費孝通，〈真知識與假知識——一個社會科學工作人員的自白〉，頁 291-292。

139 費孝通，〈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覆（後記）〉，頁 221。

140 費孝通，〈後記〉，收入《鄉土中國》，頁 77。

141 費孝通，〈後記〉（1948 年 8 月 28 日），收入《皇權與紳權》，頁 111。

142 費孝通，〈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覆（後記）〉，頁 238。

143 費孝通，〈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覆（後記）〉，頁 222-223。

144 費孝通，〈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覆（後記）〉，頁 223。

145 孟殊，〈「鄉土重建」讀後〉，《世紀評論》第 4 卷第 13 期（1948，上海），頁 14；費孝通，〈小康經濟——敬答吳景超先生對《人性和機器》的批評〉（1947 年 10 月 29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5 卷，頁 434；梁漱溟，〈略論中國政治問題——答張、費二先生〉，《觀察》第 3 卷第 14 期（1947 年 11 月，上海），頁 10。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用資料庫

年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重要現象，一個很好的現象」。[146]正是在隔閡、誤解與辯論中，新型態的知識才能誕生。

在此，在知識分子、知識、迫切需要認識的中國社會、政府，四者近乎分離的 1948 年，從對傳統中國的經濟、基層社會、政治、知識階層最後到知識性質的分析，他找到了一個將四者重新連結的方案：一種尚未成形、有待被捲入新式「政府—社會」關係中的人們共同參與，而發現、討論、形成的知識，據此訂定的計畫、政策，與在此過程中重建的地方組織。他期望著，「學院和社會切實溝通，研究和行政打成一片」。[147]

從歷史後見之明，幾個月後，北平城郊的清華園便會聽到共軍砲聲；再之後，中國傳統社會將遭遇一個教條的激進現代化方案，天翻地覆，不再存在。但在一切動搖解體前夕，費孝通的嘗試也揭示，正是配合脫栓、碎片顯露之際，使得對傳統社會的整體認識，以及基於此的另一種改革構想得以提出，並察覺到各種現代化計畫都不完整，而有待實踐過程中所有人的參與和討論。在答覆各家批評的〈鄉土重建．後記〉開頭，他寫道：

> 文字是被視作權威的，是載道的，是經典……，這個時代我想即使還沒有完全過去，也快要過去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文字不過是人類社會化的一種工具。……許多人各自帶著他個別的歷史，懷著各人的抱負，走入這個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的場合。……起初每個人，囿於自我的經驗，都會覺得自己才是對的、正確的、應當如此的。……這時，要維持共同生活不能不大家說個明白再走。……文字在這裡有了新的用處，它是用來表達一種經驗，一種看法，一種意見，不是一種真理，更不是一種教條。[148]

比較「學治」，這個方案同樣注意到知識分子飄零，期望恢復學術與社會、政治的連結。而面對晚清到五四引進的各種理想，新與舊的教條，

146 費孝通，〈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覆（後記）〉，頁 223。

147 費孝通，〈真知識與假知識——一個社會科學工作人員的自白〉，頁 293。

148 費孝通，〈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覆（後記）〉，頁 221-22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以至於政府、社會與知識的分離，他較錢穆再往前走了一步。錢穆將學術基礎置於傳統歷史文化，指出了問題，卻不易回答時代變化社會所需；費孝通則從調查地方變遷出發，將之建立在尚未形成與共同參與上，不僅從「文化精神」，更從「實用」和「溝通」重新連結知識與社會，並藉此，試圖讓社會轉型所需的新式政治，和新的知識生產、新的知識分子成為一體。

結　語

以上討論了三位學者在 1940 年代前後的學術進展與轉折，分別指出過去研究忽略的面向：張純明基層調查和「無為政治」分析、錢穆「學治」構想與現實政治的緊張、費孝通政治轉向與學術工作的聯繫，進而探討他們對中國近代政治目標轉型中，「政府—社會」之間薄弱連結的察覺與回應。三人之間雖然沒有留下明確學術交流紀錄，卻體現出共同的時代問題，形成互相關聯的回答。

綜言之可分四點。第一、對傳統政治制度的新認識。他們都對晚清梁啟超從「國家」出發的政治觀提出質疑。這一觀點認為，必須「為有意識之破壞」，破除朝廷觀念，打破各種血緣、地緣團體，把人解放出來成為國民，組成國家。儘管梁氏不久亦察覺激進政治觀弊端，「自由之說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而重估私德與修身之必要，期望菁英作用，主張以「有思想之中等社會」為主體，養成國民政治能力。惟其解方雖重視社會秩序，但仍帶有前說影響，關注抽象個體的道德修養，以「利國進群」，而非具體舊有政治制度、社會連結的合理轉型。再之後，梁氏的反思進一步及於他過去力倡的國家主義，但風氣既漸，「一切破壞」以求再造的動向並未因此停止，舊有制度連結亦長期未獲重視。[149]經過多年，才在現實危機下出現新的探討：張純明察覺縣

149 〈新民說〉連載過程中，對破壞之擔憂與思想轉折，見梁啟超，〈新民說〉，頁 683-6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下有形政治組織的薄弱，錢穆以「學治」概念重新詮釋傳統「政府—社會」關係，費孝通從文化功能分析肯定地方團體連結。三人都以實證研究，一方面繼受梁氏未竟之思考，一方面提出新的修正。

第二、新的認識既借鏡西方，也來自學術中國化反思。張氏參照西方近代歷史，注意到傳統「無為政治」沒有能力專制的特徵；錢氏對比西方政制，以「中國式之民主」，指出「學治」運作的內在理性精神；費氏由功能論出發，分析傳統地方政治的無形雙軌制度。將西方政制放入歷史演變，再對照反思中國體系，使他們在新派、左派、傳統派之外，找出一個新位置：既不同於現代化論者簡單移植制度，也賦予傳統新認識，重探過去未受注意的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以此作為變革基礎。

第三、「政府—社會」的新式關係與建設之兩難。他們都重視新式建設以及政府的作用。同時，對傳統政制之認識又使他們察覺，鬆散的舊有「政府—社會」關係，在近代政治目標下產生兩難。「政府—社會」缺少強力連結，使制度、實情分為兩截，有為建設卻反過來破壞社會。張氏提案重建政府組織以回應社會，卻遭遇中古社會與近代政治的悖論，終未能回答政府制度被濫用問題；錢氏寄予學術領導政治，卻也感到政治干預學術的現實陰影；費氏期待基於認識社會的計畫設計，又擔憂政府能否真正認識社會；他們的研究與提案，都顯示出對政府介入變革的希望與擔憂。

第四、對知識分子與知識性質的新思考。對此兩難，張氏期望提高民眾政治參與，加強「政府—社會」間的「同意」；錢氏、費氏進一步注意到過去「政府—社會」關係並非全然薄弱，而有士紳階層作為地方菁英的連結，從而反思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的作用。兩人都察覺中國知識分子與社會在近代脫節，造成盲目變革，期望重建其間連結，以確保社會、知識分子與政府的聯繫。費氏並更進一步，指出現代建設所需知識性質之變化，強調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合作研究，並寄望不同人群參與「思想社會化」，產生開放的共有知識。

714-725、728-735。惟與此同時，梁氏仍高度批判專制政體與家族制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49 年政局劇變，張純明先是短暫參加顧孟餘（1888-1972）在香港組織的第三勢力，不久接受蔣廷黻邀請，前往紐約出任駐聯合國代表團外交工作。[150]錢穆於香港主持新亞書院，專注中國文化學術思想傳承，培育下一代知識分子，很少再談及現實政制。[151]費孝通留在北平，一度對中共新政權有所寄望，1957 年對知識分子在新社會的作用提出建議，被打為右派，長期遠離學術研究。[152]隨著中共對民間社會的全面控制與改造，「政府—社會」關係的討論也顯得失去現實著力之處。其後，雖有港臺新儒家嘗試接軌傳統思想與民主政治，但或關注道德主體作用，或強調儒家理想與君主專制對立，文化價值與傳統政制都分成了二事。[153]

如是，三人各自走上不同道路，這股潛流亦未有機會充分開展，戛然中止。那麼，如何評估其歷史位置？最後，藉由幾位當時青年的紀錄與回憶，以見這一學術轉折終是潛流的原因，並說明 1940 年代在近代學術上的特殊意義。

---

150 見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二十一世紀》總第 162 期（2017 年 8 月，香港），頁 51。惟史料所限，尚無法確知張前往紐約主因是與蔣的私交，或亦涉及對香港第三勢力、臺灣國民黨政權的看法。

151 1950 年，先是張君勱，繼有第三勢力中人邀請錢穆參加新政黨，錢穆認為要於國共之外別創一新政黨，不當只求眼前聲氣廣大，而應著眼百年大計，擬定政綱，培養新精神，作久遠打算，最後終未與會。從此事亦可見錢穆專注教育的決意。錢穆，《師友雜憶》，頁 296-297。

152 費孝通，〈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1957 年 3 月 24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8 卷，頁 23-33。

153 前者如唐君毅、牟宗三，見翟志成，〈唐君毅對民主政治的想像與批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6 期（2014 年 12 月，臺北），頁 135-179；後者如徐復觀，1950 年代徐與錢穆在香港《民主評論》多有交流，但後來兩人觀點日趨相異，特別是在中國「專制政治」問題的評斷上。見黃俊傑，《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頁 46-71。另一相關課題是，國民黨退守臺灣後，儘管黨國意識形態立於首位，但也以傳統文化形塑正當性。與此同時，臺灣民間社會傳統文化保存積澱較深，亦助於日後政治民主化過程公民社會的形成，其間關係為何？惟此已超出本文範圍，有待另文探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些青年所記，正呈現歷史弔詭：最痛切感受與社會分離的知識青年，卻多半也更強烈地尋求主義，更加期待新社會，而難以跳出主義對峙，去思索自身困境與傳統制度轉型的關聯。大學生來自各方，缺少其他社會連結，往往依靠學校社團安身。隨著時局日艱，組織性討論越發激進。即便有人提出異議，左右派學生對抗，也都執著抽象簡化的主義論戰。[154]北京大學史學系的羅榮渠（1927-1996）記述，看完電影《萬家燈火》，不斷想知識分子太不中用，只是人民寄生蟲，更堅定了社會主義信念。[155]他也記下一位朋友的苦悶：北方局勢不穩，既想回家，卻又感到家鄉封建、風氣閉塞，哪裡是青年發展之處？[156]北洋大學電機系陳之藩（1925-2012）傾向自由主義，深入思考政府之壓制、教授之反對、中共之運作。但他只寄望科學論理對抗激烈思潮與輕信易躁，對傳統無所回顧。[157]關於費孝通，他僅提到進步教授們為左派學生開路，當費氏給地主想了出路，學生就不再捧他。[158]只有少數青年，如燕京大學歷史系的余英時（1930-），戰時避居農村，長於鄉間，對中國傳統社會有一定認識，而能欣賞費氏的鄉土重建方案。[159]

這些生命經驗與費孝通一段記述，正體現兩代人的差異。1947 年，清華大學復員北平，他拉上學生，說起戰前校園，月色伴著體質人類學骷髏，想的只是出洋留學……。然而卻沒有人笑，學生問「你從沒有擔

154 就讀北大農經系的余傳韜，對各種社團活動、組織性生活氣氛與其壓力，有深入回憶。見余傳韜，《雲煙集：余傳韜回憶錄》上冊（臺北：國史館，2014），頁 27-29、37-50。各地青年離家就讀大學，參與社團，接觸「進步」資訊，思想更趨激進。見北京大學校友會編，《北大歲月：1946-1949 的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書中回憶雖多帶革命史觀，仍具參考價值。

155 羅榮渠，《北大歲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1948 年 11 月 10 日」日記，頁 393。

156 羅榮渠，《北大歲月》，「1948 年 12 月 1 日」日記，頁 407。

157 陳之藩，《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致胡適信函」（1948 年 6 月 7 日），頁 81-90。

158 陳之藩，《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頁 87。

159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2018），頁 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憂過失業的罷？」他寫道，多年流浪長成的青年，「並不完全從和我同樣的假定上來規劃他們的生活了」。他說，上一代人從過去眼光認為青年幼稚過激，自己卻不能不開始懷疑曾經的道路是否正確。[160]

戰爭破壞與政府介入失能，加劇並惡化知識分子與社會脫節趨勢，帶來兩種質疑。移植自西方、尚未完備的新社會秩序，以及傳統社會團體，都面臨動搖，促使青年走向激進，也讓中年的費孝通重新思考過去忽略的連結，以及近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知識」關係。對於五四以來的激進與保守，儘管兩種質疑在思想概念層面，無論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社會主義，都未提出新事物，但在如何認識與改變社會的層面，卻有新變化：在危機中，與更加具體的社會變革方案結合。這使得 1940 年代的反傳統思潮更為加劇，朝向激進化重造社會全面開展，卻也對此出現反思，浮現基於傳統社會認識的另一種改革構想。

後者在青年迴響幾希，止於潛流，顯示出社會連結動搖之深刻與焦慮心理之深重。但作為潛流，其出現也正反映出五四思想論戰中的激進與保守，終於在現實危機中，在作為思想落實對象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上，短暫地展現出共同知識對話的空間。就此而言，這場未及充分展開的知識對話，不只是近代中國思想激進化過程中，各種無力的抵抗之一步，同時也承續 1930 年代學術發展，指向新的階段，一種新的「政府—社會」關係：當社會變革已不可避免，如何認識社會，以形成有效的知識而付諸政策實行？

七十年過去，「建造一個全新理想社會」的實驗，在文革達到高峰，終告結束。在思想史的角度，激進與保守、現代與傳統應當相輔相成，也早具共識。但這一新的「政府—社會」關係，及其問題——激進與保守在什麼樣的知識基礎上，能夠進行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公共討論——卻仍未過去。中共「抓緊政治、放開經濟」四十年，面對改革開放之後新的政治與社會問題，近年口號從漸進式的「摸著石頭過河」回到政府主

160 費孝通，〈沒有安排好的道路〉（1947 年 4 月 23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5 卷，頁 143-1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導的「頂層設計」，卻也激起民間批評，正顯示中國社會仍等待著有效的知識認識與公共討論。[161]在這意義上，儘管本文三位學者所研究的中國政制與社會已大幅改變，在告別革命後的歷史潮流裡，他們多年前見到的時代問題，仍然叩問著今日的人們。

*本文寫作及修改期間，承蒙黃進興教授、王汎森教授、林志宏教授、潘光哲教授給予建議，兩位匿名審查人和複閱人的指正商榷，讓討論更為完善，謹此致謝。

（責任編輯：歐陽宣　校對：吳昌峻　黃方碩）

161 中共在 2010 年「十二五規劃」提出「頂層設計」一詞，主張強勢政府主導，避免市場化改革弊病。經濟學者吳敬璉提出批評，但也認為這是一機會，可讓各方自由討論共識，反思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尋求改革。見〈「頂層設計」：政治新名詞反映中國未來改革路向〉，《搜狐新聞》，2011 年 3 月 13 日，http://news.sohu.com/20110313/n279795182.shtml（2021 年 1 月 25 日檢索）；吳敬璉，〈「頂層設計」的流變〉，《吳敬璉博客》，2012 年 3 月 29 日，http://wujinglianblog.blog.sohu.com/209372264.html（2019 年 10 月 30 日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與文化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北京大學校友會編，《北大歲月：1946-1949 的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田雨時，〈張純明學人從政書生論政典型：終而成其國際壇坫忠勤報國的外交鬥士〉，《傳記文學》第 45 卷第 6 期，1984 年 12 月，臺北，頁 32-36。

伍啟元、李樹青、沈來秋、林良桐、張德昌、費孝通、楊西孟、鮑覺民、戴世光，〈我們對於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當代評論》第 2 卷第 9 期，1942 年 8 月，昆明，頁 130-135。

朱學勤，〈費孝通先生訪談錄〉，《南方週末》，2005 年 4 月 28 日，第 25-28 版。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2018。

余傳韜，《雲煙集：余傳韜回憶錄》上冊。臺北：國史館，2014。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收入氏著，《李大釗全集》第 3 卷，頁 304-310。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周書楷，〈敬悼張純明先生——一位學者從政的典範〉，《傳記文學》第 45 卷第 3 期，1984 年 9 月，臺北，頁 22-26。

孟 殊，〈「鄉土重建」讀後〉，《世紀評論》第 4 卷第 13 期，1948，上海，頁 14、16。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下冊（1925）。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

胡 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上）》（1930），收入《胡適作品集》第 21 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胡 適，〈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為的政治〉，《獨立評論》第 49 號，1933，北平，頁 2-6。

胡慶鈞，〈論保長〉，《觀察》第 3 卷第 17 期，1947 年 12 月，上海，頁 10-12。

張純明，〈現行保甲制度之檢討〉，《行政研究》第 2 卷第 3 期，1937 年 3 月，南京，頁 215-230。

張純明，〈我國之高等教育問題〉，《國聞週報》第 14 卷第 23 期，1937 年 6 月，上海，頁 57-58。

張純明，〈論政治設施應制度化〉，《新經濟》第 1 卷第 10 期，1939，重慶，頁 267-271。

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194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中國積弱溯源論〉（1901），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1 冊，頁 412-427。

〈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1901），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1 冊，頁 510-554。

〈干涉與放任〉（1902），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1 冊，頁 383-384。

〈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1902），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2 冊，頁 771-787。

〈新民說〉（1902-1906），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2 冊，頁 655-735。

〈新史學〉（1902），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2 冊，頁 736-7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立國大方針〉（1912），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4 冊，頁 2488-2507。
《歐遊心影錄》（1918-19），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5 冊。
〈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1921），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6 冊，頁 3342-3347。
《中國文化史》（1927），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9 冊。
梁漱溟，〈略論中國政治問題——答張、費二先生〉，《觀察》第 3 卷第 14 期，1947 年 11 月，上海，頁 8-10。
陳之藩，《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
陶希聖、沈任遠，《秦漢政治制度》。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費孝通，《鄉土中國》、《皇權與紳權》、《鄉土重建》，俱收入氏著，《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從欲望到需要〉，收入《鄉土中國》，頁 66-70。
〈鄉村・市鎮・都會〉（1947 年 4 月 20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126-131。
〈基層行政的僵化〉（1947 年 9 月 23-24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145-152。
〈論「知識階級」〉（1947 年 10 月 18 日），收入《皇權與紳權》，頁 87-96。
〈再論雙軌政治〉（1947 年 10 月 26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153-160。
〈損蝕沖洗下的鄉土〉（1947 年 11 月 30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161-170
〈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1948 年 1 月 11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171-177。
〈後記〉（1948 年 2 月 14 日），收入《鄉土中國》，頁 71-77。
〈地主階層面臨考驗〉（1948 年 2 月 14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178-185。
〈鄉土工業的新形式〉（1948 年 3 月 9 日），收入《鄉土重建》，頁 199-205。
〈節約儲蓄的保證〉，收入《鄉土重建》，頁 213-220。
〈對於各家批評的總答覆（後記）〉（1948 年 6 月 19 日），收入《鄉土重建》，221-238。
〈後記〉（1948 年 8 月 28 日），收入《皇權與紳權》，頁 109-111。
費孝通，《費孝通全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江村經濟——長江流域農村生活的實地調查》（1938），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2 卷。
馬林諾夫斯基，〈序〉，《江村經濟》（1938），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2 卷，頁 277-283。
〈中國鄉村工業〉（1941 年 9 月），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2 卷，頁 337-355。
《祿村農田》，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
〈神經戰〉（1942 年 8 月 10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222-229。
〈雞足朝山記〉（1943 年 3 月），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252-275。
〈狂者進取〉（1943 年 3 月 20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276-278。
〈最後的一個上帝〉（1943 年 4 月 3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285-287。
〈編蠅拍的老竹匠〉（1943 年 5 月 15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290-291。
〈我們沒有分別〉（1943 年 6 月 13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296-2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初訪美國》（1945），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
〈《雲南三村》英文版的「導言」和「結論」〉（1945），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3 卷，頁 172-212。
《內地的農村》，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4 卷。
〈沒有安排好的道路〉（1947 年 4 月 23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5 卷，頁 142-145。
〈中國社會學的長成——為《日本社會學會年報》寫〉（1947 年 9 月 18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5 卷，頁 410-419。
〈亦談社會調查〉（1947 年 10 月 10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5 卷，頁 420-427。
〈小康經濟——敬答吳景超先生對《人性和機器》的批評〉（1947 年 10 月 29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5 卷，頁 428-442。
〈科舉與社會流動〉（1947 年 10 月），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5 卷，頁 447-465。
〈漫談桑梓情誼〉（1947 年 12 月 15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5 卷，頁 466-471。
〈真知識與假知識——一個社會科學工作人員的自白〉（1948 年 9 月 26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6 卷，頁 287-293。
〈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1957 年 3 月 24 日），《費孝通全集》第 8 卷，頁 23-33。
〈個人・群體・社會——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1993 年 7 月 24 日），收入《費孝通全集》第 14 卷，頁 217-240。
費孝通、張之毅，《雲南三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蔣廷黻，〈建設的前途不可堵塞了〉，《大公報》，1934 年 3 月 11 日，第 2 版。
蕭公權，《憲政與民主》，收入氏著，《蕭公權先生全集》第 8 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
錢　穆，《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4-1998。
《國史大綱》（1940），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7 冊。
《國史新論》，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30 冊。
《政學私言》，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0 冊。
《文化與教育》，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41 冊。
《八十憶雙親》（1974），《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1 冊。
《師友雜憶》（1982），《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1 冊。
羅榮渠，《北大歲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譚嗣同，《仁學》（1896）。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Chang, Ch'un-ming. "The Chinese Standards of Good Government: Being a Study of the Biographies of Model Officials in Dynastic Histories."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8:2 (1935, Tianjin), pp. 219-249.
Chang, Ch'un-ming. *A New Government for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Aspect of Rur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construction.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6.

Fei, Hsiao-Tung & Chih-I Chang.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Laski, Harold Joseph. *A Grammar of Politics*.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25.

二、近人研究

王汎森，〈「主義崇拜」與近代中國學術社會的命運——以陳寅恪為中心的考察〉，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 463-488。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 195-220。

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入氏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頁 53-90。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王銘銘，〈從江村到祿村：青年費孝通的「心史」〉，《書城》2007 年第 1 期，上海，頁 11-16。

甘懷真，〈皇帝制度是否為專制？〉，《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第 4 期，1996 年 9 月，臺北，頁 41-49。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和保守〉，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1991），頁 199-242。臺北：三民書局，2015。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頁 31-98。

余英時，〈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答姜義華先生〉，《二十一世紀》總第 10 期，1992 年 4 月，香港，頁 143-149。

沈松僑，〈近代中國的「國民」概念，1895-1911〉，收入林毓生主編，《公民社會基本觀念》下冊，頁 727-783。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4。

林志宏，〈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張冠生，《費孝通傳》。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

張馭中，〈1949 年以前的費孝通：一段學術史與思想史的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許紀霖，〈保守與激進的迷惑〉，《二十一世紀》總第 11 期，1992 年 6 月，香港，頁 137-140。

許紀霖，〈二種危機與三種思潮：20 世紀中國的思想史〉，《戰略與管理》2000 年第 1 期，北京，頁 66-71。

陳以愛，〈錢穆論政學關係〉，《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2 年第 2 期，北京，頁 154-178。

黃克武，〈錢穆的學術思想與政治見解〉，《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15 期，1987 年 6 月，臺北，頁 393-412。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19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代史研究所，2006。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二十一世紀》總第 162 期，2017 年 8 月，香港，頁 47-63。
黃俊傑，《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
黃進興，《從理學到倫理學：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臺北：允晨文化，2013。
楊清媚，《最後的紳士：以費孝通為個案的人類學史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公司，2010。
翟志成，〈唐君毅對民主政治的想像與批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86 期，2014 年 12 月，臺北，頁 135-179。
趙旭東，〈作為文本存在的費孝通——費孝通先生十年祭〉，《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 年 4 月 24 日，A08 版。
閻雲翔，〈差序格局與中國文化的等級觀〉，《社會學研究》2006 年第 4 期，北京，頁 201-213。
閻鴻中，〈職分與制度——錢賓四與中國政治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 38 期，2006 年 12 月，臺北，頁 105-158。
謝　泳，《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
鍾　誠、袁剛，〈政治學何以「本土化」——評張純明《中國政治二千年》〉，《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第 13 卷第 6 期，2009 年 6 月，北京，頁 107-112。
阿古什（R. David Arkush）著，董天民譯，《費孝通傳》。北京：時事出版社，1985。
Chiang, Yung-chen.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三、網路資源

〈「頂層設計」：政治新名詞反映中國未來改革路向〉，《搜狐新聞》，2011 年 3 月 13 日，http://news.sohu.com/20110313/n279795182.shtml（2021 年 1 月 25 日檢索）。
吳敬璉，〈「頂層設計」的流變〉，《吳敬璉博客》，2012 年 3 月 29 日，http://wujinglianblog.blog.sohu.com/209372264.html（2019 年 10 月 30 日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7 (Jun. 2021), pp.279-332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106_(67).0007

Rediscovering Tradition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or Facing the Present Crisis: New Approaches to the Government-Society Relationship Proposed in 1940s China

Lin, I-Cheng*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three studies conducted in China in the 1940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one such study, Zhang Chunming applied Western politics to analyze th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formed under the concept of 'governing by non-interference,' to rectify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systematically. But, his work also revealed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approach. In another study, Qian Mu extracted the notion of 'the politics of scholar-officials' from his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search of a response to the crises of his age, but he came to feel the irresolvable tension between this notion and modern state-building. The scholar Fei Xiaotong became aware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dual-way politics' in local society based on his rural economic survey. He finally proposed a solution based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t the time, the mainstream thought was radical reform. Why were these scholars expressing similar concerns in their analys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 subject which had been neglected for

*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No. 130, Sec. 2, Academia Rd., Nangang Dist., Taipei City 115201, Taiwan (R.O.C.);
E-mail: lastplainsong@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years? These three studies revealed a common question of their time: how to ensur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may avoid the utter destruction threatened by the sudden imposition of entirely new institutions on society, even if the government's goal is “constructive”? They reassessed the idea of defining traditional politics as ‘despotism,’ as had been done since the late Qing. In their own disciplines, they each noticed the fragility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rediscovered the position of traditional scholar-official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nd discovered after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that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dern state-building, the local social institutions had to be eliminated. Consequently, they perceived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knowledge, government. They hoped to find way to establish these connections in order to ensure a humane and effective reform plan. Although these studies did not present an intellectual discussion with each other and had few echoes, they revealed a new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fter the May Fourth period: they staked out a new position beyond the liberals / modernists, leftists and conservatives, refused to simplify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s, and proposed reform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omprehension of the tradition institutions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Western knowledge. In these ways, they expressed an alternative response to the project of ‘building an ideal new society,’ one response that would not require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old social order.

Keywords: Tradition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1940s, Zhang Chunming, Qian Mu, Fei Xiaoto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